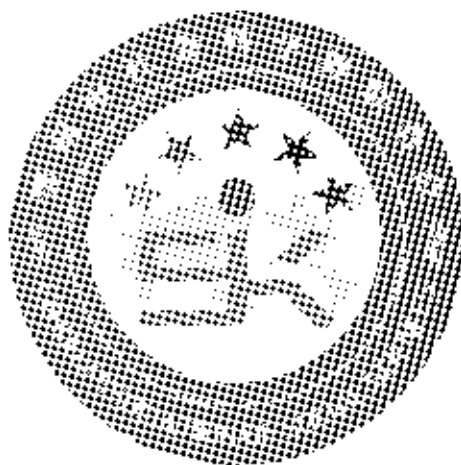


鄂州社科战线

Ezhou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4年第2期



《鄂州社科战线》编辑部

2014年6月

鄂州社科战线

2014年第2期

主 办

鄂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鄂州分院

协 办

鄂州市延安精神研究会

本刊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刘建平

副主任：罗海祥 邵南高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时文 严宇斌

吴 刚 张旗峰

张爱利 李汉波

李晓明 肖运香

苏玉霞 陈汉玲

郑祖雄 胡 刚

麻 涛 喻志斌

目 录

本刊特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理论问题.....
.....陈曙光(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初探.....
.....李碧玉(8)
浅谈民主党派如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系..... 苟永莉(11)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切实加强教育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丁永辉(15)
审计机关坚持群众路线的思考.....肖运香(19)
坚持践行群众路线 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肖少锋(21)

调查与思考

“人民本位”视野下贯彻群众路线的思考.....
.....吕云山 李 欢(24)
试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
.....江雪铭(26)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现象研究	刘东杰(31)
------------------------	---------

城乡一体化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创新研究	市委政研室课题组(34)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与突破	市委政研室课题组(40)
鄂州市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时晖(43)

人文鄂州

试论古噩国及“鄂”文化的相关问题	市博物馆课题组(45)
一块石刻 再现瓜圻三国文化光彩	万齐文 余国桥(54)

工作研究

浅议利用税收化解社会分配不公	杨重理(56)
浅论文艺人才创作研发资源的有机整合	邓文兴(58)

名家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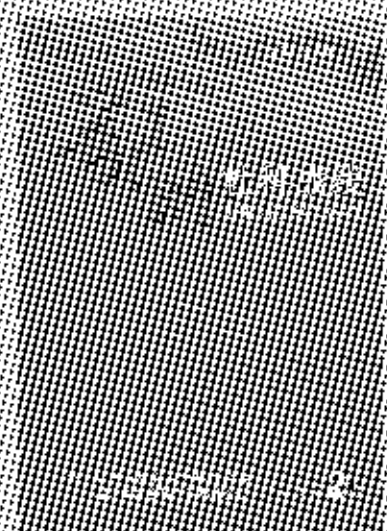
陈静、张友来简介	徐喜元(61)
----------------	---------

社科信息

省社科院调研组来鄂州调研等	李 志(62)
充分发挥检察学会“两器”作用 推进全市检察工作 科学发展	张友来(63)

文摘·杂谈

让潜规则失去生存的土壤	辛士红(64)
-------------------	---------



主 编: 郭南高

副 主 编: 辛 升

责任编辑: 徐喜元

李 志

尹智强

封面设计: 曹晓波

出 版: 《鄂州社科战线》编辑部

地 址: 鄂州市滨湖东路特1号

市委大楼910室

电 话: 0711-3830078

邮政编码: 436099

邮 箱: ezskzx@163.com

网 址: 鄂州社科网(www.ezsk.com)

准印证号: 鄂州内图字2013年第12号

印 刷: 鄂州日报社印刷厂

设计/排版: 华艺图文设计工作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理论问题

陈曙光

一

国家的自立自强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自立自强,也包括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自立自强。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自觉与自信,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性课题。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价值观念系统,其中的内核与灵魂即表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有象征自己精神内核的文化符号,即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名片和文化标识,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身份证”。缺乏自身的独特价值观,对内难以获得认同,难以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在对外交往中则不可能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识、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核,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向世人展示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思想理论前提,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份密码的“DNA”,是“中国梦”的价值愿景。惟有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清晰地界定“我是谁”,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才能清晰地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西方人在其思想旗帜上鲜明地写着“自由、民主、人权”几个大字,依凭“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通行全世界,以至于不少人把西方当成理想的天堂向往之。其实,只要仔细剖析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不难发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仍然是一种“虚假的共同

体”,它作为某种独立的、异己的东西同个人相对立。每个人都生存于这个“虚幻的共同体”中,在这里,所谓“自由”就是商品交换和贸易的自由,就是“资本”和资本占有者的自由,就是资产者占有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就是无产者向资产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自由,就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就是“自由得一无所有”,“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完全沦为虚假的东西。所谓“民主”,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就是资本家之间的民主,就是形式似乎真实而内容颇为虚假的有钱人的游戏。所谓“人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实质远没有它所宣传的那么美丽,其核心就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然而,西方国家却始终以普世价值标准的裁判者的身份出现,对非西方国家指手画脚。今天的中国,应该明确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密码,是我们向世人出示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上写什么,不写什么,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如果我们自己含糊不清,就给了别人随意杜撰和发挥的空间。

当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对当代中国来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信仰缺失的一种政治智慧,是重建现代价值秩序的一种对策方案,是回应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一种实践考量,是直面西方价值观挑战的一种理性选择,是走出“躲避崇高”世俗心态的一种干预策略,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顶层设计。

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否成立的前提条件。如果缺乏中国自身独特的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是不确定的,“北京共识”就是模糊的。

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本身的内涵。我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厘清:

第一,是“中国自己”的,而非任何其他地方的。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书写。一直以来,西方人总是在替我们说;我们说慢了,就给了他们编造和以讹传讹的时间;他们的编造都不符合中国的事实,却符合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总是有人打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旗号,期望以西方的特殊价值作为我们的选择,以西方人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即所谓“西化论”。“西化论”将文化权力和文化责任交给了西方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他者”,这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而是一种文化责任的缺失,是文化权力的放弃。中国人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责任,盲目地将西方人无偿提供的价值观念置入中国的实际,由于无视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特殊性而必将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最终陷入西方人所预设的“美丽陷阱”。因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言,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恐怕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能起到“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作用。“西化论”期望以西方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人,这是一种“文化软骨病”。当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决定了两大核心价值形态

之间必将处于长期共存、互相竞争的复杂关系中。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而非任何其他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本质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形态、当代形态和中国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凝练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因此将某些中性的概念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恐怕是不可行的,将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也是不可取的。比如,现在有人提出将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忠孝、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重新上升为核心价值,即所谓“复古论”,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实质上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它没有经受过近代科学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煎熬,从总体上来说,它仍然是落后于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资本主义文化;至于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相比,它更是低一个层次。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农耕文明时代曾经是先进的,但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它的意义范围和作用领域则是有限的。如果试图用它解决诸如现代社会治理、现代政治建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时代课题,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复古论”奢望以古人的智慧来解决今人的问题,将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古人,这是被历史抛弃了的方案。

第三,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而非任何其他阶段的。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遵从生活实践的逻辑,体现强烈的现实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如果抛开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主观地建构一套价值观,即使建起了也难以落地生根。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社会主义阶段还很长,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高远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思维,这样才能适应中国未来发展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会主义阶段必然会为更高级的阶段所代替,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超越发展阶段,提出

只有未来社会才能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有人以“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中华复兴、世界大同”或“自由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作为核心价值观,我以为,这中间恐怕有的内容就超越发展阶段了。“世界大同”、“自由个性”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也许是成立的,但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则为时尚早。

第四,是“核心”部分,而非边缘部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上升为核心价值观。学术界目前已经涉及的90多个范畴绝大多数都属于社会主义价值观,都不应该否定。但所谓核心价值观之“核心”,就是要体现崇高性、先进性和主导性的特点。所谓“崇高性”就是要占领道德制高点;所谓“先进性”就是要体现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把握、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定位;所谓“主导性”就是要支撑和影响其他所有价值判断、引领社会的发展进步。比如,“互助”、“团结”、“进取”、“发展”等范畴就不具有崇高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就显得勉为其难。再比如,“忠孝”、“仁义”、“明礼”、“孝悌”、“廉耻”等范畴就不具有先进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把握人类的前途命运、引领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就显得力不从心。还比如,“团结”、“和平”、“劳动优先”等范畴就不具有主导性的品质,期待以此来支撑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就显得无能为力。

第五,是“观点”,而非“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同一关系,也不是比肩并列的关系,而是包含关系、从属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但又高居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顶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集中表达和最高抽象,是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追求、价值目标和前景构想。既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明确,就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期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科学的;也不能因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脱离它而另搞一套。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依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性质定位: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就是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人民民主”、“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不是背道而驰,而是相向而行的。

2、地位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中的“核心软实力”,是“文化国力”的核心成分。客观地讲,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赖以维系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长久稳定和繁荣的内在精神支撑。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不例外,它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前提和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犹如社会的“方向盘”,缺了它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犹如人身上的“钙”,缺了它就难以自立;犹如社会的“黏合剂”,缺了它就失去了共同奋斗的的思想基础;犹如社会的“稳定器”,缺了它就会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

3、归属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取向和价值规范浓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内涵的集中表达和最高抽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最具决定作用、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是中华民族长期秉承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根本原则和价值观念的集合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型和系统化,必将其更大的辐射力、更广的影响力和更强的吸引力而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必将渗入民族的文化血脉和人们的心灵深处,进而发挥代代相传的价值传递效用和塑造现实的价值引领作用。

4、时间定位:管当前,管长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管当前,也管长远;立足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当前”与“长远”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前”关乎稳定大局,关乎社会和谐;“长远”关乎发展大局,关乎事业成败。立足当前,不愿长远,难以为继,“当前”会因为没有目标而迷失方向;相反,立足长远,不愿当前,横在眼前的坎都迈不过去,再美的“长远”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必须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要求。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底是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现时代的问题强烈地提出了凝练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未来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为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凝练出真正有长远指导意义的、体现未来发展趋势和规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类历史看,几个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都具有稳定性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旦确立,就应该保持相对稳定,不宜随意变动。当然,这不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出台就天然地具有了某种一成不变的、静态的、封闭的本性,它仍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常提常新。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既具有现实指导性,又具有前瞻性;既能管现在,又能管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5、空间定位:管全局,管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的顶层设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性根本性问题的筹划。所谓管全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而非个别性或局部性的问题;所谓管根本,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涉及的是当代中

国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而非次要性或细枝末节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总揽全局、驾驭全局、引领全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根本矛盾和突出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抓住了根本就抓住了全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适应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阶层、某一行业的局部价值观,它不同于人民警察的核心价值观、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于北京精神、上海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的全局性、整体性特征,反映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价值诉求,反映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6、功能定位:管目标,管方向。目标指引方向,确立什么样的目标,就会引向什么样的方向。目标和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首要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核心价值观的竞争,关乎谁引领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和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的方向,谁主导国际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座标杆、一面旗帜,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代表着先进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引导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今天的世界越来越以价值观来划界,世界秩序正在按照文化价值观重组,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走到一起,出现了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西方国家利用价值观已经发起针对中国的价值观之战。日本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繁荣之弧”。可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初探

◎李碧玉

探索适合高校特点的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具有时代性和紧迫感。它不仅丰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一种有效途径。笔者从高校课程载体建设、高校班级文化建设、高校校园道德建设等方面,对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进行了探究。

一、探索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路径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融汇统一,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内核与精髓,为高校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指明了方向。探索适合高校特点的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具有时代性和紧迫感。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能否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各种挑战的必然选择,还是确保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的迫切需

要。努力探索适合高校特点的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可以为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有效路径借鉴。

探索适合高校特点的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不仅可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而且可以为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尤其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具体实施提供一种有效途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校园、进入课堂、进入学生头脑。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中存在着制约他们健康成长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功利色彩强,社会理想弱;道德认知强,道德行为弱;时代感强,责任感弱;虚荣心强,诚信度弱;自我意识强,自我评价弱”。因此,积极探索对大学生群体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路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大学生价值认同,有利于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有利于引领社会思潮,为大学生价值选择提供导航;有利于为大学生提供道德规范,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努力使当代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二、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路径初探

(一)在高校课程载体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课程载体建设,是指通过开展课程教学来实施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它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以及其他课程等两大类。笔者认为,为了充分发挥该载体的积极作用,应当抓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当中,这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重要途径。为了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落实到思政理论课程教学当中,就一定要实现以下两个转化,也就是要实现从理论到课本,再从课本到教学的转化。为了实现前者,就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更加合理地结合到教材之中,并且和原来各章节中的内容实现融会贯通。这就需要编写思政理论教材的专家首先应当切实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核心内涵与基本精神,这样才能保障教材内容可以在贯彻总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实现新的改变。而这只能说是实现以上转化目标的首要步骤。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切实进入到大学生头脑之中,还需实施第二个关键性转化,也就是从课本到教学的转化。这一转化的实现,需要立足于持续探索教学新方法,从而激发出大学生群体的学习积极性以及求知欲。比如,可以转变传统意义上的灌输型教学方式为指导性教学,不断提高大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意识与能力,在讲解那些较为抽象的理论时,就可以从大学生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切入,让教材理论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让大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理论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性。同样,师生还可互换教学角色,让学生们在备课与授课中真心感受到理论的重要性。

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到各专业、各学科教学中,这是提高主导力量的重要因素。应当说,我国高校各课程均有育人的功能。所以,在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重要地位的基础上,还要深入发掘其他学科课程所具有的价值传递之功能,让其把知识的讲授和价值的引导相互结合起来,把科研和思想育人相互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到高校各学科

课程当中。就专业技能与价值观融合的视角来观察,只有良好的专业能力但是却没有正确价值观的大学毕业生,将无法满足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甚至还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在致力于培养各学科专业化人才的同时,应当让其更加深刻地理解与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有用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是专业课程教师,均应认可、理解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所教授的理论才会具备强大的说服力。

(二) 在高校班级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良好的高校班级文化,是开展日常思政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基础。高校班级文化相对于教学来说,主要是向大学生群体传授思想观念等内容的,以班级主要活动为载体,以广大师生为主体,以班级物质环境、价值观以及心理倾向等为特征,能够体现出班级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为此,应当在三个方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强化高校班级文化建设。

一是要强化班级物质文化建设。一流的物质环境具备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与感染力。在强化班级物质文化建设上,应当运用目前已有的条件,将教室布置得体,使每一面墙壁、每一个角落均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从而建立起更富教育意义的物质文化,让大学生群体在不知不觉间就能自然得到熏陶与感染,发挥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思想政治功能。

二是要强化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健全班级制度并不等于自然就形成了本班级的制度文化。班级制度文化是否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为班级制度是不是能够为全体学生所认可。一旦班级制度能为全体学生所认可,那么班级制度这一外在文化也就能转化成全体成员的共同内在文化,从而发挥出制度文化所具有的作用。唯有当班级制度文化能够切实转换成素质文化之时,才能真正形成本班级的制度文化。班级制度文化转为素质文化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班级

辅导员应当发挥出自身优势与作用,在贯彻落实班级制度时加大力度。应当注重对班级制度意义的宣传,让每位成员均能充分地了解到各项规章制度的内容和遵守制度的意义,从而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大学生们的认可,并且把这一强制性要求切实转化为大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在班级制度落实上,应当做到一视同仁和人人平等。应当注重保持规章制度的稳定性,认真听取大学生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建议,从而努力做到扎实可行与富有操作性。在具体实施时,则应保持班级规章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从而对加强班级制度文化建设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是要强化班级行为文化。所谓班级行为文化,主要是指班级所实施的各类活动。在大量高校中,班级文化未能发挥出良好的教育功能,特别是日常思政教育方面的功能,这就会导致班级文化生活过于单一和沉闷,以至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与向心力。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打造良好的班级行为文化。为此,在班级行为文化建设上,应当积极引进一些紧贴时代的鲜活而又格调高雅的内容,从而为高校班级文化活动增添新活力。为了提升班级文化建设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一定要深入研究与合理利用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和心理变化,做到因势利导。当然,班级活动的开展一定要富有价值,具有一定目的,并且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到活动当中。同时,班级活动还应当注重创新,特别是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当取得新突破,从而得以运用班级行为文化建设,使全体大学生在活动中提高见识和受到启发,并且为高校思政工作提供更高的平台。比如,各班级可以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演讲和辩论活动,从而统一思想,形成班级核心价值观。

(三) 在校园道德建设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道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以善恶来实施评价的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高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人才。培养全面发展并且具有和谐个性的人才的过程,就在于教育者应当关心人的各方面特征的完善,并且以此为基础,关注受教育者各个方面特征的和谐,这些均是由某种主导性的东西加以决定的,其中具有决定作用和主导成分的即为道德。所以首先就应当将大学生群体的道德素质放在首位来抓。

根据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要求,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抓好高校校园道德建设。一是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把提高大学生的公民道德水平作为校园道德建设的主要方向。要实施好公民道德文化的宣传活动,不断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公民道德意识。要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教育,通过学习和宣传先进典型,引导大学生群体不断提升道德判断力以及荣誉感,在高校校园中形成讲正气、讲诚信的良好行为风尚。要强化大学校园的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更好地维护法律权威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强化文化修身建设。要将提升大学生群体的文化修养视为校园道德建设之核心。在大学开展校园文明修身活动,就应当将文明修身理念贯穿于课堂、寝室以及日常管理之中。更加广泛地开展高校学生志愿服务,积极拓宽大学生校园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以校园道德文化活动为主要依托,积极倡导实践爱国、敬业、友善等核心价值理念,从而切实形成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和谐人际关系。三是要加强诚信建设。要将大学生诚信教育列入道德建设的重点。要努力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健全高校学生诚信档案,不断加大对大学生不诚信行为的惩治力度,从而在高校校园内建立起守信光荣和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探索,努力找出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路径。

(作者系鄂州职业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喜元)

浅谈民主党派如何树立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 苟永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各民主党派要准确把握内涵、结合党派自身特点,把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化和延伸,突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一、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古国,封建主义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所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改革开放也使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诉求、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加之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我国当代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当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意识繁杂的形式下,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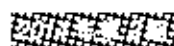
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在思想大

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通过其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表现出来,相冲突的价值观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其利益冲突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只有以统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实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深刻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推动力量,也是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政党。民主党派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



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客观要求,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和发挥作用的要求,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迫切需要。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引领个人价值取向的作用,能够有效抵御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巩固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使民主党派广大成员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沿着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进。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极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民主党派应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这个价值体系需要在全社会宣传推广,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真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

1、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思想是民主党派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思想应该成为民主党派的精神支柱和指导思想。在社会思想观念多样化的当代,我们更需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有效引领和整合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进步。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联系的纽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利益和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样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国家、民族与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激励着我们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团结奋斗。

3、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新时期民主党派与时俱进的动力之源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坚强、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更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保障,是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的精神支柱。各民主党派要不断发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做团结创新的典范和楷模,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我们坚持改革创新,既要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长处,又要自觉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求真务实,锐意改革。

4、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民主党派规范自我的准则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残留的封建主义道德的

影响依然广泛存在,同时又面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道德的侵蚀给道德领域和社会关系带来深刻复杂的变化。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把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紧密结合起来,提炼和概括出八个方面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是民主党派规范自我行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三、民主党派如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各民主党派作为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一份责任,更是各民主党派自身思想政治建设的需要。处在新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各民主党派应当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核心价值观的定位,积极参与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要求的、富有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党派特色和优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优势和作用。要使各民主党派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统一思想,树立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

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政党的行动指南。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特殊的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只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并变为党派成员自觉的行动,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当前,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一些成员在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显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尤其是西方多党制、两党制,议会制等政党观念的影响,在思想上产生的一些困惑、疑虑和消极情绪。因此,在现阶段,各民主党派要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和民

主监督职能,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弘扬中国先进文化,这与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也是确保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在行动上同心同行的现实需要。

2、加强学习,增强民主党派精神动力

各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民主党派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发掘前进的内在动力。深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思想建设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核心,也是建设学习型参政党的核心。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搞好思想建设对民主党派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主党派要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日常工作抓好抓实,完备学习功能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基础,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学习进步的机制,形成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和团队学习的理念。坚持把提高自身建设水平和履职能力作为建设学习型参政党的最终目的。民主党派要积极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加强学习型参政党建设,加强参政能力建设的新理论、新途径、新方法,提高民主党派组织整体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共事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履行职能的能力和水平。

3、坚持正确导向,培育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必须在长期实践中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持共同理想信念,坚持共同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相一致,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事业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其成员相对固定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形成了以团结合作、民主协商为鲜明特点的政党文化。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党派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应当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体现各民主党派自身的特色。要善于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并赋予其新的进步理念,使多党合作的“民主性”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民主党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当以民主党派进步性建设和参政能力建设为主线。民主党派价值观的进步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要适应形势变化,站在时代前列,不断进行充实和调整,才能始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始终体现时代进步的要求。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培养团结合作、民主协商精神的价值观,在重大是非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真正做到与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在统一性的前提下,具有独立的精神、独到的优势和独到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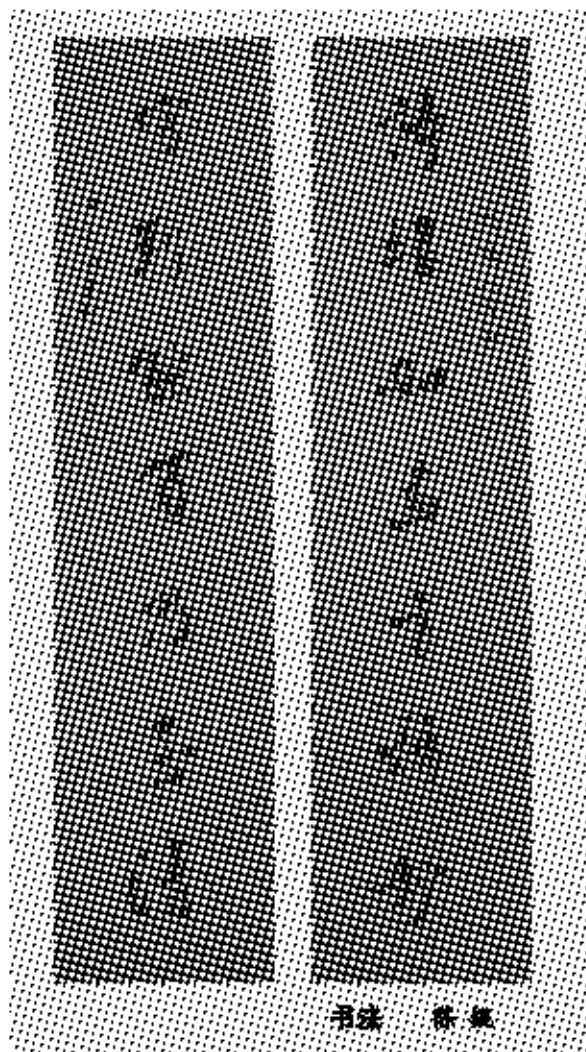
4、立足本职岗位,努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融入在各项工作中,体现在具体行动里。一是在参政议政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民主监督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在服务社会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在合作共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关注民生,认真围绕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并善于从发现问题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为民说话,为政府建言献策,为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促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推动在参政议政中实现参政党的核心价值观。要在民主监督中讲大局、讲原则、讲团结,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于讲真

话、讲实话,做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通过社会服务活动的具体实践,使广大各民主党派会员在帮助他人中收获喜悦和快乐,也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升华。要坚持“和而不同”,在尊重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共识,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利益、本党派利益与单位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服从整体和全局需要,进一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成员的自觉追求,用具体的行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者单位:鄂州职业大学)

(责任编辑:尹智源)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扎实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丁永辉

坚持走群众路线,根本就是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教育事业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关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如何行之有效地搞好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保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是教育战线的领导干部应当积极思考和率先践行的头等大事。

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顺应民意，国兴；违背民意，国亡。“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理论根基。

(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

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重要，提出了“重民”、“爱民”、“贵民”、“利民”的思想主张。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意思是，民众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国家，国君再次之，直接阐明了“以民为贵”的思想。荀子则形象地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意思是，君主为舟，民众为水，水可以载

舟,也可以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民舟水论”。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君对民的依存关系。战国时期管仲最早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汉代贾谊提出为政治国须“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新书·大政上》)的主张。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本。”(《贞观政要·论务农》)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尤为突出。宋代包拯提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谧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包拯集·请罢天下科率》)元末明初,刘基提出了“用民作手足,爱抚勿伤害”(《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的思想。清代康有为认为:“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上清帝第二书》)上述这些民本思想,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思想作了很好的历史注解。

(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着牢固的理论根基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真谛,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自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政治立场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党宗旨和群众观点要求“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列

宁也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列宁选集》第4卷第695页）离开了人民群众，孤立的个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如同离开大海的一滴水很快就会干涸。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源头活水”。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正是在改造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同志则鲜明指出，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成为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同志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的十八大3万字的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45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短短1500多字的演讲中，“人民”一词出现了19次。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人民的作用、我们对人民的责任、我们不辜负人民的重托和期望，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价值多元化、诉求个性化，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复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难度增大；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

部存在严重的“四风”问题，这无疑是对新形势下党群、干群关系的严峻挑战，对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必须切实打牢人民这个根基，丝毫不能动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教育的责任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从诞生之日起，教育就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术规范的社会活动，肩负着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教育就是要将其培养成身心和谐、品格健全、适应社会、为社会作贡献的人。教育要在制度、目标、措施与方法层面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真正做到“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具有不同天赋、潜能，不同气质、性格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最充分地实现他们作为“大写的人”的价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多地体验到被人关注、被人爱护的温暖和幸福，更多地体验到自由探索、成功的快乐和自豪，更多地感受到人性的光明与和煦，感受到仁慈、宽容和敬业的力量。

对于社会来说，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当今世界，教育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手段，而且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史证明，现代化生产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再是劳动力的数量、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教育为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人才，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教育对文化具有传承、选择、交流、创造的功能。教育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民族兴旺，让人民更加幸福地生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行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要让家长放心，让学生成才的教

育。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人民大众对教育的殷切企望。

(二)教育有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现象依然存在

现实中，教育存在诸多不良现象，严重违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理念。

教育行政部门落实教育惠民政策不够，教育还不公平；

关注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热点问题力度不够，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现象。

学校存在办学行为不规范现象。少数义务教育学校不按国家教学计划开齐开足课程，以及下午延长放学时间；少数民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没有严格执行“三限”政策；少数中职学校委托中介机构招生和进行有偿招生；没有严格执行收费制度，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服务性收费中，没有执行学生自愿和遵守非营利性原则，没有严格执行教辅资料使用管理规定，落实“一科一辅”要求，没有做到“未经公示，不得收费”；没有落实收费治理工作责任制；没有坚持校务公开制度，招生工作不公开透明；校园安全存在隐患，没有及时受理家长的投诉。

教师存在师德不良的问题。不关爱学生，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从事有偿家教，到社会办学机构兼职授课。

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本质要求

针对教育存在与“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符合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将加大全体党员干部教师廉政、廉洁的工作力度，督促并引导每个成员努力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践行者。

(一)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为平台，深入开展反腐倡廉

在“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邀请党校教授给党员干部讲廉政建设教育课，学习中共中央“八项规定”，省纪委“六项禁令”，组织观看“廉政之风”

宣传片，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七彩阳光”（阳光招生、阳光收费、阳光财务、阳光资助、阳光人事、阳光办学、阳光政务）活动，推进廉洁文化进机关。在活动月中做到：一是教育学廉，夯实思想基础。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营造勤政廉洁、昂扬向上、创先争优的机关文化氛围。二是政策兴廉，丰富廉洁内涵。着力打造开明优惠的政策环境。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教育网等媒介，公开单位职能、监管举措、许可办理、服务承诺、监督途径，建立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三是助学思廉，彰显爱民本色。组织机关干部到帮扶点开展帮扶活动。四是制度促廉，打造廉洁防线。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廉政公开制度、勤政廉政制度、重大事项决策议事规则等，着力形成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的机制，从制度上保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二)以推动廉政文化进校园为切入点，不断增强师生崇廉敬廉爱廉的自觉性

大力创建省、市级廉政文化进校园的示范学校。各中小学开展一期黑板报、一节班会课、一次故事会、一场演讲赛、一本课外书的“五个一”廉政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三)以“规范办学年”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规范管理工作

1、突出“十项重点”，开展“五个着力”。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关于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工作方案》和《关于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欺压群众、奢侈浪费等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方案》，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十项重点”腐败问题，开展好“五个着力”。“十项重点”是：各级各类学校乱收费问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乱发教辅资料问题；招生过程中的违纪问题；教育设备采购环节的违纪问题；基建领域的腐败问题；教育后勤保障领域的违纪违规问题；教师乱办班、乱补课问题；贫困生资助以及学生公用经费的违纪问题；党员干部玩忽职守、教师违背职业道德的问题；政务、校务公开问题。“五个着力”是：着力解决思

想认识问题;着力解决重点问题;着力解决案件查处问题;着力建立长效机制问题;着力解决舆论宣传问题。

2、规范办学行为。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足开齐各类课程,严格执行学生课外作业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严格规范学生的作息時間。

3、深化中考及招生制度改革,促进高中教育优质发展。加强考纪考风建设,实行考点集中。将重点高中全部指令性计划分配到学校。严格执行“三限”政策,实行“阳光招生”,做到招生政策、计划、程序、录取结果、投诉办法、收费标准、违规结果“七公开”。各高中招收“三限生”比例均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四)以“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为抓手,加强政风行风管理

1、畅通渠道抓“信访”

(1)“零距离”了解民意。教育行政部门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重心前移下移,建起多级信息网络,采取教育、协商、调解等多种有效方法,注重重心下移,变上访为下访,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使矛盾纠纷“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维护教职员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一是坚持每月安排一次领导接待群众预约来访,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问题。二是有序开展领导公开接待。在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接待的领导、时间、地点。三是扎实进行机关干部“下访”。注重工作重心下移、窗口前移,实行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访制度。

(2)“教育热线”联结民情。教育行政部门开通“教育亲民热线”,设立“便民接待室”。规定每月某个时间由领导带队,率相关科室负责人到“便民接待室”接待群众来电来访,为广大学生及家长对我市教育工作相关疑问进行解答并听取意见和建议。

(3)开门纳谏倾听民声。积极开展“三进”、“三评”、“三谏”、“三诺”活动。即机关干部进学校、校长进教室、教师进家庭;学校评机关、教

师评校长、家长评教师;学校向机关提建议、教师向学校提建议、家长向教师提建议;机关向学校承诺、校长向社会承诺,教师向家长承诺。通过“三进”知民情,通过“三评”找位置,通过“三谏”找差距,通过“三诺”表决心。各学校充分发挥“家长学校”的平台优势,通过举办“学校开放日”、“校长信箱”、知识讲座、随堂听课等形式,坚持开门纳谏,加强家校沟通,形成育人合力。

(4)惩防结合化解“民怨”。通过教育宣传和明察暗访的形式,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中考重点高中招生生源分配问题,体育中考、实验操作中考评分问题,尽力预防腐败发生,让人民群众无怨言,切实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2、严格“四不准、四落实”抓“收费”。“四不准”是不准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不准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范围;不准挤占、截留、挪用、平调义务教育保障经费;不准虚报骗取义务教育保障经费。“四落实”即落实领导岗位职责、落实收费公示制、落实责任追究、落实教育经费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岗责明确,绩效挂钩”的原则,制订“以岗定责”的考核办法,严格对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

3、实行“五条禁令”抓“师德”。五条禁令是:严禁教师饮酒后进入课堂和在课堂上吸烟、使用移动电话;严禁教师滥订、滥发或推销学生用书目录以外的教辅资料;严禁教师举办以收费为目的各类补习班或从事有偿补课活动;严禁教师歧视、讽刺、侮辱、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严禁教师接受家长请吃或向学生和家长索要、变相索要礼金等违规行为。教育行政部门不定期深入开展师德“五禁止”行为规范专项督查活动,确保师德师风明显好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者系市教育局局长)

(责任编辑:李 志)

审计机关坚持群众路线的思考

◎肖运香

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群众观念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审计机关和审计工作也不例外。审计机关践行和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全面履行审计监督的职责。审计监督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进改革、促进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审计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加大对危害国家和群众利益行为的监督力度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违纪违规的问题较多,特别是腐败现象、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审计机关作为“经济警察”,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群众利益的历史重任,必须做到依法审计、善于审计和敢于审计。

一要严格履行宪法和审计法赋予的职责,依法审计。要通过对财政预算执行、财务收支、经济责任、政府投资专项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审计,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做到依法履责就应坚持“三个必须”: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高度的政治自觉,明确为谁而审,为谁而计的职责;必须克服凭经验办事。加强学习,特别是现行法律、法规和财政、财务规章的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跟上时代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要求;必须科学履职。在审计评价、效益评价上,科学研判,客观公正,准确定性,揭示问题,处理问题,运用法律法规既要自如,又要准确。不能模棱两可、张冠李戴。

二要坚持审计监督的全覆盖,善于审计。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次中纪委全会上指出:“公款公用,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乱用。”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到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审计全覆盖。这不仅给审计工作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而且是给予信任、赋予重任。审计部门必须紧盯公共资金流向,不能有“监督空白”,也不能留“监督死角”。要创新方法和手段,自加压力,重点揭露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和损害人民利益的问题。善于审计,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对审计干部审计能力的检验。每一名审计干部应当行家里手、多面手、领军人物。

要当行家里手。每个审计人要有目标和高定位,既能当主审,又能当组长,不仅要有独立审计的业务技能,而且具备组织协调、善于总结分析、解剖麻雀的能力。

要当多面手。审计干部不仅要当行家里手,更要当多面手。要克服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单位与企业、投资与财务、资金与资源、经济与效益、经责与管理的相互脱节,要解决就账看账,不善于解剖分析,只会查账不会运用

计算机,审计深度不够等问题,必须通过轮岗交流、学习培训、审计案例分析、现场交流、优化组合等形式,全面提高审计技能,做到一人多专,一专多能,人人都是多面手。

要当领军人才。在提高审计人员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的同时,还要结合干部实绩考核,健全引入人才、技能竞争机制。除鼓励大家在技术职称、学历水平晋升外,还要搭建竞争平台,设置审计技能标兵、计算机审计标兵、查处问题能手、优秀项目审计组标兵岗位。使每个审计干部都有舞台展示自己的才华,形成全局上下比学赶帮、争先创优的竞争氛围,促进更多的优秀干部成为审计工作领军人才。

三要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敢于审计。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去年我省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办法,今年我市也出台了问责办法,审计机关要应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办法,全面推进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重大违纪违规线索、重大决策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行为,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真正做到敢于审计。敢于审计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要有铁的手腕。按反腐败的要求,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细心和决心做好审计工作,真正为人民办事,替人民负责。用真情、真心、真本事全力投入审计工作的全过程,及时发现问题,揭示问题。

要有铁石心肠。首先要过人情关、亲情关、说情关。做到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对事不对人,揭示问题不留情面,不含私情;其次是严格控制个人及审计组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利益输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原汁原味传送审计信息,接受审计审理,实行审计业务会议集中审定,集中定性,集中处理;再是要替历史负责,审计过程、审计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增强防范审计风险,实施审计监督的同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上级审计监督。

要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既是审计机关的内在要求,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常言道: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坐了人家的腿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审计干部必须恪守执行审计“八不准”和“中央八项规定”等各项纪律,做到严于律己,执审为民。

二、审计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充分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审计工作政策性强,要有效开展,必须依托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关注利民惠民政策和相关资金的落实、使用情况,揭露阻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得到落实。

首先,在制定审计计划时,要“问需于民”,变“关门审计”为“开门审计”。在审计机关开展“我为审计贡献一策”等活动,发动全体审计人员为制定审计工作计划提合理化建议。在外部,主动征求党委、政府和人大的意见,主动向政协汇报审计工作思路;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让全社会共同来做审计计划。努力做到审计计划与实际,计划与“呼声”相适应。

其次,项目实施中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让人民群众做审计的参与者、合作者。审计工作既要坚持原则,执行政策,也要适应转型发展,与时俱进。在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的合理性、效益性上,要按照“三个有利于”和群众满意不满意的标准和尺度科学研判,合理决策。

第三,审计结果应公开,提高审计的认知度。审计的结果在于运用,审计结果既要体现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还要体现社会性和认同性。这样不仅能保证结果的运用,而且能加大社会的监督,促进问题的整改落实。

三、审计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加强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

一是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下转第30页)

坚持践行群众路线 提高舆论引导水平

◎肖少锋

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生命线和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党报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现在,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报人清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的好时机。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践行群众路线,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党报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着力点。

践行群众路线一定要树立群众观点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党报的群众观点。1948年4月2日,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报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了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人民性,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

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作为报人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不能单面强调党性,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为人民服务,不应是一句口号,而应该落到实处。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一提党报,就说我们是党的报纸,是市委机关报,是市委市政府的耳目喉舌。这样说并没有错,但只反映了一个方面,党报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党报姓党也姓人民。为什么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主要是群众观点树得不牢。在一些人看来群众只有诉求和麻烦,对我们的工作、工资、仕途都没任何影响。所以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或心中无数或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置若罔闻。当别人称我们无冕之王时,还心存喜悦,到基层采访时还以“官”之居,摆出官样。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群众,对群众没有感情,那么必然会淡忘宗旨意识,忽视社情民意,群众与党报之间就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群众怎么会爱看党报呢?自然就会说“党报没什么看头”、“党报说的是套话假话空话大话”。党报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党的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党报的形象与党的形象关系重大。对党报的不信任,也会影响对党的信任。党报自

身的事业发展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失去根基。失去了群众,哪怕通过行政渠道发行,也不足以真正占有市场,更不会发挥应有的舆论引导作用。因此我们新闻工作者要从根本上树立群众观点。

践行群众路线一定要怀有群众感情

群众感情首先体现在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上。毛泽东同志提倡“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中,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新闻工作者应带着朴实无华的感情,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群众身边去了解群众、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增进群众感情的有效途径。本报的《记者夜宿农家》开展十多年了,近几年本报还开展了《我是建设者大讨论》、《百村千湾记者行》、《记者新春走基层》、《记者走基层·聚焦生态农业》等体验报道活动,都是采编人员很好联系群众载体。通过这些活动记者们切切实实地接了地气,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受到了群众的称赞。实践证明,只有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经常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多把视角对准基层,多把版面留给群众,新闻报道才会更真实生动,更吸引人,更全面。才能深入地体现党的意志。报业也才能蓬勃发展。

“走转改”既应成为常态,也应时时保持“我是建设者”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走转改”成为形式。记者“身入”基层,走近群众,关键还要“心入”,切勿“走一路,吹一路”,和群众“貌合神离”。你不把老百姓当朋友,老百姓对你就不会有真感情。

当前有一些媒体“天天围着领导转,围着明星转,缺少了老百姓的呼声”。新闻版面被各级领导占据;报道时政新闻,引述的基本都是官方消息,空话套话,格式化;报道财经问题,采访的都是投资商和经济专家的信源;而普通百姓在新闻中得到呈现的并不多。尤其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工、残疾人等更难以进入媒体报道的视野,他们的状

况更难引起社会关注。这需要我们全体报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鲜花掌声淹没群众的声音,避免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避免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刘云山同志的讲话给新闻工作者指明了方向,“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最能衡量我们工作的长短优劣。”

因此,在“大众媒体”时代,怀有群众意识,带着群众感情,坚持“走转改”,既符合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也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时代潮流。通过与群众面对面、手拉手,增进与群众的感情,通过“访民情、解民忧”体验百姓生活,才能发出百姓声音,写出让受众喜闻乐见的“三贴近”稿件。党报群众爱看了,党的观点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党报的引导职能才能更好的发挥。因此,党报应该以坚定的勇气和决心,旗帜鲜明地履行社会职责,拉近社会距离,增进群众感情。反之,麻木不仁、“隔靴搔痒”甚至“讳疾忌医”,只会让群众的信任进一步流失,何谈引导舆论、动员群众、凝聚共识?正如网友所说,“走基层不能带着框框,只摘花,不挑刺。我们这个党领导的社会肌体,多去毒刺才会更健康、更强壮、更长寿、更有战斗力,在世界上发挥作用会更大!”

践行群众路线一定要善用群众语言

践行群众路线首先要解决好受众的定位问题。有的人认为,党报只为社会主导人群提供信息和思想服务。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观点,因为党报是一种执政资源,而党的执政对象不只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企业主管和知识分子等少数社会主导人群,还有数量庞大的普通大众。人民群众是党报最主要的评判者。

受众的定位问题解决了,有数量庞大的普通大众,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他们容纳什么,排斥什么;接受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鄙弃什么;感激什么,厌恶什么等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不断增强报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就要让群众看得懂,语言就要通俗。毛泽东同志是向群众宣传的高手,关于宣传工作的通俗化,他在《反对党八股》里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共产党员如果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就是这样一篇严肃的训令式演讲,也讲得妙趣横生。

善用群众语言,就要善学语言,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一方面要不断吸收生活中新鲜活泼的语言。毛泽东把脱离生活的语言比作上海的小瘪三,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瘦得难看。群众语言来自于生动的生活,为生活的实际服务,它是朴素的,又是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语言。比如,人生气了,群众说“发火”、“冒火”、“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搞得鸡犬不宁”、“搞得鸡飞狗跳”;又比如,人很固执,是“三头牛都拉不回”,人很木讷,是“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等等,这些语言既通俗,又形象,还有几分俏皮。

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语言成果中有生命力的东西。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都是群众语言长期沉淀的结晶,形象鲜明、言简意赅,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以成语为例,对一个“笑”的表情的描写,就有“回眸一笑”、“捧腹大笑”、“哄堂大笑”、“嘻皮笑脸”、“破涕为笑”、“强颜欢笑”、“笑容可掬”、“笑里藏刀”、“眉开眼笑”、“喜眉笑眼”、“笑逐颜开”等等,千姿百态,神形兼备。

新闻语言应当是群众能够理解并喜爱的,这是检验传媒是否走群众路线的最直接的标准。而群众喜闻乐见词汇成为传媒甚至党报新闻的用语,则更是对“群众路线”的拓展。如201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给力”一词的使用引发网民赞许,称“《人民日报》采用网络新词是顺应网络潮流,亲近网民的表现”。而“给力”原本属于网络语言,最早出现于日本搞笑动漫《西游记:旅程的终点》的中文配音版,属于东北方言和日语的混合产物,意思类似于

“牛”、“很棒”、“酷”,常作感叹词用。党报调整语言风格,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甚至网络词语来表达,都是增进亲和力、贴近群众的表现。

总之,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新要求,党报要立足实际,始终践行群众路线,使宣传工作更加入情入理,更好地服务党、国家和人民。

(作者系鄂州日报社副社长)

(责任编辑:徐喜元)



图面 夏延辉

“人民本位”视野下贯彻群众路线的思考

◎吕云山 李欢

群众路线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路线。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越是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纪检监察机关越要贯彻群众路线。当前,纪检监察机关应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坚持“人民本位”,着眼于改善民生、维护民权、发展民主,切实维护群众各项权益,推动扎扎实实地贯彻群众路线。

一、着眼改善民生,建立群众利益保障机制

利益问题,是群众的根本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贯彻群众路线,必须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根本目标,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民生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根本利益。

1、建立群众利益的决策机制。群众利益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从建议入手,尊重群众意见,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加强教育宣传,引导督促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利益至上”的理念,防止出现漠视民利、与民争利、以权谋私、脱离群众等问题。健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机制,用好的作风选作风好的人,解决“少数人选少数人”的问题,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促进党员干部既对党的事业负责,又对群众负责。

2、建立群众利益的协调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和民生导向,着力协调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针对干部作风存在的庸懒散奢问题,严格执行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各项纪律要求,开展常态化的监督检查,从领导干部带起,从点滴抓起,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改起,切实转变会风、文风、事风、话风,树立

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的良好形象。针对发展环境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创新服务理念,对群众要求办理的事项作“有理推定”,对群众诉求作“有解推定”,对群众投诉事项首先作干部“有过推定”,完善行政服务体系,推动行政服务提速提质提效;推进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改革,规范和限制自由裁量权;着力整治“三乱”问题,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优化发展环境。针对民生政策落实不到位问题,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的“八字经”,推进教育收费、医疗服务、环境保护、征地拆迁等民生领域专项治理,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保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通过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案件,发挥查办案件指引导向、正本溯源的功能,强化对党员干部的警示作用,同时针对查办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督促发案单位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促进查办案件成果向预防腐败转化。建立风险防控机制。将是否损害群众利益相关情况纳入廉政风险防控范围,对风险迹象实行快速预警、及时纠偏,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现象的发生。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将群众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增加日常考核比重,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表彰、晋级提拔的重要依据,形成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的倒逼机制。

二、着眼维护民权,建立群众权利保障机制

腐败的实质是公权力滥用,当前的民生问题无一不是由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监督、

权利没有得到伸张所引起。纪检监察工作的使命就是要在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中,通过加强对权力制约监督,保障群众的基本权利。

1、明晰权力授受关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是能否贯彻群众路线的前提。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是权利的保障。权力的行使应以群众权利为边界,在其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权利。要教育引导权力行使者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深刻理解“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内涵,强化宗旨意识,把群众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按照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对群众做到“法无禁止即自由”,切实保障实现群众各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对政府自身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规范公共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和权力滥用,坚决纠正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现象。

2、完善权利实现机制。权力行使如果得不到约束,就会扩张、膨胀,往往以牺牲权利为代价。解决好实现权利“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限制和制约权力是必然要求。围绕保障群众知情权,深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将公开事项向农村村组、向网络延伸,实行点题公开、及时公开和全面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围绕保障群众表达权,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实行听证、公示和专家论证等制度,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有机会充分表达不同意见,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利益。围绕保障群众监督权,坚持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重、实体监督与程序监督并重、制度监督与科技监督并重,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流程管理和过程控制,促进权力规范、廉洁运行。围绕保障群众评价权,坚持民评民说,开展电视问政、政风行风评议和民意调查工作,建立“第三方”评价机制,把话语权交给群众,使民意导向成为评价工作的最终标准。

3、畅通权利救济渠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把维护群众权利同充分履行纪检监察“再监督”职责紧密联系起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行政、司法相关部门的互动沟通,发挥信

访、行政调解、司法诉讼等权利救济方式的各自优势,着力构建行政问责、党纪政纪处分、法律制裁相互衔接的法纪之网,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增加群众的认同度和满意率。

三、着眼发展民主,建立群众参与保障机制

民主是民权和民生的保障。没有民主,民权不可能实现,民生只是空中楼阁。要紧紧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强化群众是反腐主力军的理念,建立有利于群众参与的机制和环境。

1、通过广泛宣传增强群众参与的自觉性。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充分挖掘地方廉政文化资源,推进廉政文化向农村、社区、工地、学校、家庭延伸,在全社会形成崇廉尚廉的良好风气,增强群众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廉洁意识,鼓励和引导群众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形成愿意参与、敢于监督的良好氛围。

2、通过搭建平台增强群众参与的便利性。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群众参与平台,建立常态化的直接联系群众机制,通过接访下访、住村入户、对口联系等方式,征求群众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健全“信、访、网、电”四位一体的信访举报机制,使得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众都能采取相应方式表达诉求。加强宣传培训,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理性表达诉求,依法依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降低维权成本。

3、通过完善制度增强群众参与的有效性。完善群众举报受理程序,建立举报人信息保护和奖励等制度,防止群众投诉举报后遭打击报复的现象,降低群众参与风险。严格执纪执法,对反映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直查快办,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重大案件实行上提一级办理,提高结案率、反馈率、办成率和满意率,增强群众参与信心。建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应对处置和合理引导机制,有效利用“网情”线索推动案件查办,发挥网络反腐“正能量”,保护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市纪委)

(责任编辑:李 志)

试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绩效 评价体系的构建

◎江雪铭

摘 要：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和改善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基本依据，是增强党的群众工作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由于内容、主体、对象的多样化、效果的多重性等原因，群众工作的评价难度较大，也是目前党的群众工作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有鉴于此，建立科学有效、客观公正的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必须在正确分析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复杂性的基础之上，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

关键词：群众路线；工作绩效；评价；构建

构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节，不仅为党提供咨询参考，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它不仅是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探寻原因，提出建议，发挥批判性建设性的功能，使我们准确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涵义及其重要性

（一）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涵义

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是指依据一定的

原则标准、程序和方法，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成绩和效果进行评判的行为，目的在于取得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方面的真实信息，以作为调整党的群众工作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群众工作的依据。从评价机构的权力和地位看，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可以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内部评价是指由党组织系统作出的评价，又可分为从事群众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实行的评价和非从事群众工作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实施的评价。外部评价是指由党的组织系统以外的机构和人员作出的评价，主要包括人民群众的评价、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评价和新闻媒体的评价等。

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是指由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各相关要素（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标准、评价方法等）形成的有机统一、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完整体系，旨在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它不仅需要建立明确的标准体系、程序规则体系和方法手段体系，还要明确评价的参与主体及各自地位、功能；不仅需要建立对具体群众工作做出客观公正评价的制度体系，还要建立正确运用评价结果的制度体系。

（二）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首先，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开展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是检验群众工作绩效的基本要求和基本途径。任何工作的开展，如果没有相关的评价工作，那它的绩效就不得而知，其目标的实现就难以保证。一项具体群众工作开展后究竟有什么效果、其实际效益和效率如何，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往往并不是一目了然，表面的观察和实际的情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有必要利用一切可行的技术和手段收集相关资料和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科学阐释，以确认其实际绩效，总结经验与教训。通过绩效评价作出的结论，是对有关组织和人员予以奖惩的依据，是对具体工作肯定与否的标准。

其次，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开展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是决定群众工作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伴随一项工作的不断推进，该项工作是应该继续、调整还是终止？其他地区、今后再出现类似工作应如何开展？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仅凭想当然，必须做到有理有据，而道理和依据的取得则依赖于对该工作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科学合理的评价。通过工作过程中的评价，如果发现工作环境和条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工作运行良好，就需要继续实施和执行该工作方案；如果发现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原工作方案的继续实行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就需要对原方案予以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如果发现预期目标已经实现，工作已没有继续的必要或意义，或者发现工作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该项工作的继续或调整都不能实现预定目标，就需要终止该工作而代之以新的工作。同样，通过对一项工作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价，能够为在其他地区或未来的某一时期需要进行同样的或类似的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减少盲目性带来的损失，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再次，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开展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是合理配置工作资源的基础条件。一项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一定的资源支撑，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在明确一项工作价值的基础上，必须合理确定资源的投入顺序、数量和比例，以寻求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尽量小的资源成本谋求尽量大的绩效收益。而要做到工作资源的合理配置，就需要借助于工作绩效的评价。绩效评价可以为工作资源的投入和配置提供科学的依据，可以与以往同样或类似工作的资源配置情况进行比较，看其是否合理，保证工作的优质高效进行。

最后，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开展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评价，有利于促进群众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新形势下，那种主观命令式的、无跟踪反馈、期望一劳永逸的传统群众工作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实现群众工作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已成为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建立评价体系，完善群众工作的评价制度机制，遵循客观规律，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建议，开展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正是促使群众工作走向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自党成立以来，党的群众工作绩效一直是高的。新形势下，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和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转变，党的各项工作逐步引入论证和评估机制，包括群众工作在内的党的工作开始走向科学化、制度化轨道，这为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问题却很少被专门提及，更谈不上客观、全面的开展。可以说，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是目前党的群众工作过程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具体来讲，当前党的群众

工作绩效评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各级党组织往往偏重群众工作面上的布置安排,忽视工作进展情况的检查、评价。经常见到的是,在特定任务面前,在上级的要求下,被动应付开展群众工作,往往是开始时有声有色,最后悄然消失。党内承担党的群众工作评价任务的一些有关部门也对评价工作缺乏科学认识和认真态度,多为视其可有可无,能不评价的尽量不评价;迫于需要评价的,又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掩盖或曲解工作中的某些事实,更多的是侧重正面效果,对负面效应浅尝辄止,甚至避而不谈,把评价当作炫耀工作绩效的手段和歌功颂德的工具。

(二)评价标准不明确

“评价的基本标准因未能全面考虑而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存有很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不能很好地把握群众工作的原则、目标和导向。每项群众工作的具体标准更是未能科学确立,要么使用固定的模式标准,用一套统一的指标衡量任何一项工作;要么制定的具体标准不符合群众工作的特点和实际,使得标准和工作呈现“两张皮”现象。特别是某些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党组织对党员进行考核时,往往只注重运用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判断,而忽视确立事实标准进行事实分析。

(三)评价主体单一

党的群众工作的评价主体更多的局限于党的各级组织,主要是党的组织系统内的评价。而在党内,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专门机构,主要由党的组织、宣传、纪检部门或临时性机构做出,并且往往把群众工作放入对党组织或党员的综合考核中予以评价。再则,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专业人才匮乏,现有从事群众工作考核、评价的人员一般都身兼数职,且长期以来形成了听从上级指挥、按上级意愿行事的行为模式,不习惯或不愿对党的群众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及绩效提出

质疑。这种自体评价及非专门、专业的评价难以保证评价工作的有效开展和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四)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方法不科学

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制度散见于一般性或其他工作制度的规定中,没有形成专门的规章制度。就是现有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对评价工作的诸方面予以协调、全面的规定,既存相互冲突的地方,也存有制度真空,致使出现评价行为不规范、主观性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科学有效的评价方法和手段是评价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条件,现在对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还是采用传统的座谈、考核、调查研究等方法,而且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未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引入先进的科学的方法与手段。

(五)信息资料 and 评价经费欠缺

部分党组织及有关部门不重视信息管理,资料记录不全,相关数据不准确,信息处理凌乱,加之很多内部资料不对外公开,使得评价机构和人员获取信息存在种种困难。而且,某些部门或人员抵制对自身所开展群众工作进行评价,或者拒绝提供关键性资料,或者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这进一步增大了获取准确信息的难度。由于评价工作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评价所需经费筹措困难。目前评价经费唯一的来源是上级部门拨款,常常存在拨款不及时、不到位、不充足,下级部门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人为减少评价款等问题。

三、构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对策

(一)提高对评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建立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推进评价工作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加以重视。首先,要让全社会,尤其是党的群众工作部门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意义。这需要加强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使人们认识到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有助于党的群众工作的推进和监督,有助

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实现和发展。其次,必须端正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指导思想,改变视“评价”为“评优”、为“歌功颂德”的错误观念,正视评价的“批判性”、“建设性”功能。最后,要认识到评价工作的改进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既不能裹足不前,也不能鲁莽激进。

(二)明确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衡量党的群众工作绩效高低的尺度和参照物,标准的明确是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基本前提。评价标准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标准。基本标准是任何党的群众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共同的、宏观的、基础性的原则和要求,旨在保证每项群众工作的正确方向。这需从群众工作对党群关系的影响、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及群众工作的效益与成本等方面予以考虑、建立。二是具体标准。具体标准是特定群众工作所应遵循的原则要求,是基本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旨在使各种不同的群众工作都具有明确的衡量尺度。这需要认真考虑特定群众工作的性质、目标、任务、特点予以制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具体评价标准时,不仅要注重建立主观性价值标准,还要注重建立客观性事实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是科学、准确评价一项群众工作绩效的客观要求。

(三)扩大评价主体

上面谈到,目前党的群众工作绩效的评价主体过于单一,且存缺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必须加大培育力度,扩大评价主体,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一是规范、健全党自身的评价组织。当前情况下,首先要强化承担群众工作绩效评价任务的有关部门、机构的评价职能。其次要考虑改变现行群众工作决策、执行、评价时有不分的状况,把群众工作的政策制定、执行开展、绩效评价分别交由不同部门和机构独立履行,使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同时,加强评价队伍建设,在对现有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的基础上,注意引进专业人才。二是把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纳入评价主体范围,确立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地位。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如何,归根结底要由人民群众作出评判。这需要营造良好的民主评价氛围,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充分考虑和尊重人民群众的评价结论,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评价的热情。三是鼓励群众工作的关注者参与评价,支持、引导他们健康发展。学术团体和民间科研评价机构一般超脱于党的群众工作涉及利益之外,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其评价结果更具客观、公正性。有关报纸、杂志、电视等新闻传媒和互联网站也应是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参与主体。

(四)健全评价制度

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除了思想上的软约束之外,还需要辅以规章制度的“硬约束”。绩效评价的制度化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实现绩效评价的程序化、制度化。或建立单独的绩效评价程序规则,或将绩效评价的程序规则体现于党的群众工作制度中,保证对每项群众工作都能按照一定程序有条不紊地予以评价。第二,建立评价经费保障制度。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评价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同时要吸收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第三,建立评价结果反馈制度,促进评价结果的消化、吸收。评价结果做出之后,应立即反馈给有关党组织和党员。结果的反馈不仅提供有关群众工作的成绩、效益和改善建议等方面的信息,而且提供存在的问题、缺陷和不足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与相关党组织和人员的奖惩直接联系起来,真正实现群众工作过程中的责、权、利相统一;必须为重新评价、调整工作目标和后续群众工作政策方案的制定服务,使评价真正起到促进群众工作科学化、合理化、高效化的作用。

(五)建立评价的信息支持系统

收集、整理、加工和使用群众工作信息资料,为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服务,是群众工作绩效评价的基础工作之一。由于群众工作的复杂性、涉及领域的多元性、影响的广泛性,要全面收集群众工作信息应在群众工作过程的开始阶段就建立群众工作信息系统,对群众工作信息的收集、加工、交流和使用进行理论研究和总体设计,以改进评价系统,使评价活动更科学有效。群众工作信息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系统全面客观地记录有关群众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投入和产出及外部环境变化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建立这样的信息系统,必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特别是群众工作的决策者、执行者、利益相关者)、快速的信息网络。党的群众工作部门除了法律和党纪规定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群众工作的制度背景、执行情况、评价结论等信息均应该通过网络及时向社会发布,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截留、失真,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者、执行者、评价组织和机构及

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促使党的群众工作实现良性发展。

(六)引入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

进行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必须借鉴其它领域先进的评价理论和经验,引入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当前,国内外公共政策评估所普遍采用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前后对比法、对象群体评定法、专家评价法、自评法等,可以为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方法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评价方法方面的借鉴和引入,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和党的群众工作的现状,实现本土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在引入科学评价方法的同时,注意采用互联网、大众媒体等技术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群众工作理论的创新,各种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将会不断地推陈出新,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保证党的群众工作绩效评价方法和技术手段的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尹智源)

(上接第 20 页)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坚定信念和增强宗旨意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认识,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性和行动自觉性,强化科学审计,审计为民。

二是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审计工作效能。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努力实现审计管理系统化、审计方法现代化、审计资源集约化。加强审计计划、组织管理和成果利用的统筹协调,强化立项调研、方案制定、现场实施、复核审理、定性处理、审计报告、结果公示等环节控制,做到计划更加科学、实施更加规范、成果更加有效。

三是着力打造党和人民满意的审计队伍。审计机关应严格遵守审计工作“八不准”纪律、

保密纪律和各项廉政纪律,严格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决不能因为党和人民的信任,就骄傲自满,放松自我,要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法律高度负责,无限忠诚,时刻自律自省自警,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积极践行审计人员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审计精神,做到崇法求真、高尚求进、善于谏言、无私无畏、尽责担当、严谨细致、勇于创新。针对“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完善制度建设。尤其是审计机关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讲真话、干实事、敢担当、敢作为;带头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审计一线,深入群众的表率;带头做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表率;带头做学习实践、锐意进取的表率。

(作者系市审计局局长)

(责任编辑:尹智源)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现象研究

◎刘永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指明了我国农村政治的发展路向与具体举措，为农村政治民主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基元。1978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原本单一的农村阶层出现了分化，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农村经济能人群体的出现和崛起。农村经济能人的出现改变了农村经济政治发展的景象，越来越多的晋入富裕阶层的精英积极介入农村政治，带来了农村政治的新元素。基于多种原因，晋入相对富裕阶层的经济精英，并非都会积极介入政治。一般而言，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政治分三个层次：浅层、中位与深度。从总体来看，这一能人群体介入政治大多尚处于浅层状态，存在疏远政治甚至排斥政治的现象。

倘若他们能够积极介入农村政治过程，可能会带来农村政治民主发展的重大改变，“尽管其参政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如果对它进行适当积极有效的引导，建设积累式基层民主制度，则会使其在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主导作用。”因此，有必要鼓励更多的浅层介入政治的农村经济能人积极深入介入政治，以自身影响力推动农村政治发展。

农村经济能人对政治浅层介入的不利影响

1. 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农村经济能人

因相对较早步入富裕阶层，更容易成为别人模仿学习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会成为风向标，其一举一动会受到其他群体的关注。因此，他们的行为选择通常也会给其他未富群体带来较大的示范性作用。当农村经济能人对介入政治表现为一种逃避、拒斥的态度，那么这种政治行为选择也会或强或弱地影响到其他“追随”群体的行为取向。当农村经济能人只是在具体行为取向上表现为远离政治的时候，也许这种不良的示范效应还不会太大，在诸如利益等其它的诱因作用下，其他农村公众也许会矫正行为选择，远离示范影响，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但是当农村经济能人不仅在个人行为上便显出对政治强烈反感，甚至针对农村政治发布一些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贬斥观点时，那么这种他的行为选择的示范作用可能会得到较大的强化。其对政治的行为取向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消极舆论的策源载体而被不断地叠加强化，最后可能形成一种带有明显偏见性的价值规范系统，如对积极介入政治的农村经济能人持一种“利益竞逐论”。因此，一定意义上而言，一旦农村经济能人的政治选择行为转化为一种带有偏颇性的舆论批判时，那么其行为选择的示范性影响力会得以进一步加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演变成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规范体系。

诚然，应否介入政治过程，以及在何种层次上进行介入，这既取决于个人自由选择，也是个人处置权利的权利，他人是无权干预的。但农村经济能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因其行为具有较强的示范性作用，因此，对其过分消极

的政治行为在必要时应加以适当的干预和规范。

2. 削弱农村政治参与的效度。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农村经济能人,历经市场考验、社会历练,可能通常会比一般农村居民拥有着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强自信心。因此,其参政能力也通常较强,他们的介入可能更有利于农村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当然,我们不否认存在着少数经济精英并不具备较开阔的眼界与较强的自信心,也不否认一部分非经济精英者就在经济领域外强过经济精英分子。但总体而言,农村经济能人这一群体的素质是高过农村其他群体的。鼓励和动员这一群体介入农村政治是充分利用优质参与资源的体现。现实中,农村经济能人基于多种原因,浅层介入政治的现象还较为普遍,这无疑是参政资源的较大流失。据一项针对淮安市 135 个村庄《淮安市农村政治参与度》的调查显示,135 个村庄共计经济精英 831 名,其中深度介入农村政治的有 76 名,中位介入的有 148 名,其余 607 名为浅层介入。浅层介入政治的农村精英占总经济精英比重约为 73%。反映出农村政治参与优质资源的流失也是很大的。

3. 带来农村政治合法性资源流失。合法性“通常用来指政府与法律的权威为民众所认可的程度”。农村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领域长期以来缺少关注。人们更愿意从宏观层面上论述政治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农村政治虽是国家整体政治领域的边缘,但仍存在着被认同的合法性问题。一项关于《淮安市农村政治参与度》的调查结果表明,村民对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过程和结果的认可度平均值为 57%、对于集体事物表决的程序和结果的认可度为 46%、对村干部总体满意度为 43%、对村务公开结果的认同度为 37%。在“山西省柳镇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 15% 的农民对基层干部给予肯定的评价;基层干部中,认为与群众关系紧张的占 47.5%,认为与村民关系良好的仅占 3.8%。”从农村公众对农村这几项政治运作的核心部分或要素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结果来看,普遍存在

着对农村政治认同度较低的现象。据调查,这其中存在着公众期待的经济精英为被选入政治核心、部分农村经济能人疏离政治带来的不利示范等因素的作用。这也说明,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带来农村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原因

(一)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自身内在原因分析

1. 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农村经济能人文化水平整体欠高,限制了其对政治的认知水平,进而养成冷漠的政治心理,妨碍其有效地介入政治。他们获得经济上成功后,才会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上升,这种逻辑会使其形成一种僵硬的思维定势,使其将维护和增强经济实力作为首要的人生目标,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经营上,从而没有多余精力关注农村政治领域,造成疏离政治事实,长此以往必将形成冷漠的政治心理。同时,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其对政治的认知和政治价值的理解通常也是偏颇的,很可能将政治视为“祸端”,为安全起见应远离政治,这也是其形成对待政治冷漠心理的重要原因。

2. 志趣使然。农村经济能人因经济上的成功而获得了社会地位、话语权等身份附属品,这很容易导致一种守卫“安全感”的心理,对于有可能带来威胁的因素,通常都会引起其反感和反对,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威胁,因此这部分人很自然地便选择疏离政治,培育其它志趣爱好。部分农村能人虽无任何政治偏见,但政治天然地不是其志趣领域的现象,与介入政治领域相比,他们宁可选择农村公益、取得更大经济成就等。受个人志趣的影响,少部分农村经济能人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非政治领域,更多的是被动地介入到政治领域,形成政治浅层介入现象。

3. 身份转换目的。实现身份的转换既是农村经济能人经济成功的动力,也是其经济活动的目的。这一点在许多经济欠发达,观念较

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2010年一项在山东省相对较为落后的菏泽地区开展的题为《农村居民对于城镇化的态度》的社会调研表明,80%以上的农村居民期待移居城市,其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农村精英更是达到93.2%。当经济精英将自己的奋斗目标或远景期待定位在身份转换目标上,那么他通常会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上,从而对于农村政治参与便不再关注。

(二) 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的外在因素分析

1. 农村政治失范现象。农村政治的运作存在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规范性文件及村民自治纲领、使农村政治失范的现象。如“在农村普遍存在宗族派性,家族、派性之间的矛盾,往往在选举时会集中暴露出来,各自为政,互相攻击,把村级组织换届视作家族、宗派势力的比拼,家族势力的较量。”对于集体公共事务决策、村务公开等方面,目前也还存在着书记、主任“一言堂”,村务公开“真假账”等不良现象。这些失范现象的存在使一部分原来抱有较高政治参与热情的农村经济能人,在对农村政治的信心丧失及惧怕“招致祸端”的考量下变得冷却下来,他们对政治参与的选择也就出现浅尝辄止的情状。

2. 独特的农村舆论场的影响。农村舆论对于居民的观念认知、行为取向等都起着重要的规范和塑造作用。一项舆论在熟人社会中会迅速发酵,而产生较为持久的影响力和舆论效力,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通常会变得更强。不同于开放的城市舆论场,当在农村中出现对于农村整治的负面舆论评价时,其影响力在封闭的环境中不断被强化叠加,迫使一些经济精英对政治介入产生观望心态。获取经济成功的农村经济能人,通常也会萌发对自身形象和美誉度的关注,当某一舆论可能影响到其形象和美誉度时,他们通常会选择规避舆论影响。目前,广泛存在的农村政治失范现象,使农村政治负面舆论评价较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精

英介入政治的层次。

3. 地方政府对经济精英介入政治的不同态度。在发达省份,地方政府对待农村经济能人政治介入大多持鼓励态度,视其为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江浙一带通过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借助村民自治制度提供的民主选举渠道,通过竞选担任了村干部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陆续地出现了一批私营企业主主政的村庄。”甚至在一些地方的“双强双带”治村模式普及率已达到75%以上,这对于当地农村经济能人介入政治的深化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中西部一些较为落后的省份,许多农村能人一旦深度介入政治,很可能会出现罔顾整村利益,而形成“宗族”利益至上的不良政治现象,许多地方政府反对他们深度介入政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一群体对政治的深度介入。

结语:

推动农村政治民主化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国家政治科学化发展的必经之途,要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化的顺利发展,对于农村经济能人这一群体绝对不能忽视,有必要在适时治理这一群体浅层介入政治的问题。针对上述分析,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做好农村经济能人浅层介入政治问题的治理工作:在主观方面应加大对农村经济精英的培训力度,提升其文化水准,使其摆脱冷漠政治心理,掌握必要的政治参与技术;多途径培育农村经济能人的政治志趣及在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逐步破除二元身份意识。在客观方面应完善农村政治运作规范,强化法律规约,消除农村政治失范现象;改造农村舆论场,使其更具开放性,建立组织化的农村舆论引导小组,使农村舆论及时得到更新和规范;通过改造政治文化和东西部交流学习,逐步消除落后地方政府对经济精英介入农村政治的担忧心理。

(作者单位:江苏淮安行政学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徐喜元)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创新研究

市委政研室课题组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突出表现为城乡分割、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城乡关系是整个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各种关系的变化大多与城乡关系变化有关,或是由城乡关系变化决定,或是以城乡关系变化表现出来。鄂州市是湖北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和综合改革示范区,近年来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剖析其城乡一体化实践探索,对于全国以体制创新推进城乡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鄂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创新的实践与成效

(一) 鄂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创新的实践

近年来,鄂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抢抓综合改革示范、城乡一体化试点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创新,把科学发展中的难点作为改革的攻坚点,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了突破,初步形成了具有鄂州特色的改革路径。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行大部门制改革,市级政府部门由32个精简为27个,区级党政群机构由32个减少到20个,在湖北省州市中机构设置最少。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已由原来的234项精简至74项,项目建设类和市场准入类审批时限分别缩短到62和5个工作日,实现了在全省项目最

少、流程最简、收费最低。在葛店开发区撤销乡镇政府,组建功能区,逐步将区以下管理的学校和医院上划市级管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市级统筹、标准统一,从“市-区-乡镇-村”三级政府四级管理,转变成“市-功能区-新社区”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全面建设“网上政府”,搭建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网格化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网上服务平台,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重心下沉到农村新社区。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制度改革,增强国有投融资平台融资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市区之间税收分享比例和财力结算办法,增强市政府全域统筹和均衡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力度,激发开发区(区)发展经济的活力。

2、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域滩涂养殖权、农村房屋所有权五项权属确权颁证,颁证率居全省前列。成立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建立农村产权的交易规则和平台,同时开展城乡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和占补平衡指标交易。组建市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建立公司核心业务运行和风险控制体系,支持农村土地整治和新社区建设。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解决了农业产业化资金来源问题。土地指标交易,破除了农村新社区建设资金的瓶颈。去年以来,累计办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5000多万元,带动社会资本1亿多元。土地指标交易

1057.6 亩,交易资金 1.69 亿元。鄂州成为继成都、重庆之后,全国第三个规范开展土地指标交易的试点城市。

3、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网格化管理等城市管理理念引入农村,在全省率先推行城乡一体网格化管理,全市共建 3462 个网格,实现网格无缝对接全覆盖。启动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大湾、石竹、路口等社区已率先实现创建目标。加快推进电子政务进社区,借助电子政务平台,创新印章管理制度,通过实行前台受理,后台审批,变“人在路上跑”为“事在网上转”,实现 83 项公共服务在社区现场办结或者限期办结,基本实现群众办事不出社区。坚持培育与规范并重,从社会管理最薄弱、最紧迫的环节入手,依托高等院校,培育一批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急需的专业人才。

4、承担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任务。鄂州是全国 16 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我市积极创新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试行院长职业化,推行临床路径全覆盖,在城乡一体的服务体系、大卫生框架下管理体制、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服务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医疗便民惠民服务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成为全国中小城市典型示范。统筹推进计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幸福人家促进计划”试点和“明天计划”工作,建立“四位一体”的家庭发展指导服务体系,推进流动人口计生网格化管理,受到国家人口计生委充分肯定。建立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在线、人工、社会调查相结合的信息核对路径,城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试点被民政部推荐为全国 4 个示范市之一。同时,梁子湖生态环境保护、节水型社会建设、土地整理全覆盖、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青-阳-阳-循环经济带等改革试点、机制创新和项目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取得新的改革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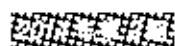
(二)鄂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取得的成就

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鄂州市微观体制日趋健全,宏观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为全面突破

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进了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一体化发展。

1、统筹全域规划,城乡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编制完成市域规划,《鄂州市城乡总体规划(2011-2020)》得到省政府批复。在此基础上,着力对现有规划进行深化和完善,建立从新区总规、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到新社区规划自上而下的城乡规划体系。突破以行政区划抓发展的思维定势,规划建设 1 个主城区和葛店开发区、三江港区、鄂州开发区、鄂城新区、花湖开发区、梁子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红莲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等 7 个新区,重点建设 10 个特色镇,将农村 320 个行政村规划集并为 106 个新社区,构建以主城区为龙头、若干个新区为支撑、特色镇为链接、新社区为基础的“四位一体”新型城镇体系。坚持全域规划全域管理,整合市域规划管理力量,在区、新区设立规划分局,向各乡镇派驻规划联络员,每个村(新社区)明确 1 名村干部为规划助理员,建立起“统一规划、分级审批、重心下移、加强监督”的城乡一体化规划管理体制,实现了市域规划编制、审批、监管三个全覆盖。严格落实“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建设一盘棋、管理一张网”制度,做到统一规划,分级审批,重心下移,加强监督,坚决落实“不在没有规划的地方建房子,不建设有规划的房子”。

2、推动产城融合,经济支撑能力进一步加强。坚持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有效防止“空心化”和“孤岛化”现象的发生,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着力提升主城功能品位,筹资 67.2 亿元,加快主城区 55 个工程项目建设。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采取政府引导、公司投入、市场运作的模式,成立项目公司,按照一个主导产业、一个建设开发主体、一套高起点的规划、一批高标准的基础设施项目、一个明确的开发建设时序的要求,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和战略投资,重



点建设清洁能源、电子商务、农产品进口加工、环保、新材料等五个百亿元乃至千亿元产业集聚基地,推动沿江滨湖新区开发建设。梁子湖区全面退出一般工业,建设以梧桐湖新区为核心的 500 平方公里生态文明示范区,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坚持新社区、新产业同步发展,创新规划引导、迁村腾地、项目拆迁、城中村改造、产业培育、环境整治“六种模式”,大力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目前建成和在建的新社区达到 71 个,在沿长港、梧桐湖等地已初步形成“一线串珠”新社区示范带。以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市级龙头企业发展到 55 家,形成了特色水产加工、畜禽加工等 7 条产业链,102 万农户加入产业化链条。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兴办家庭农场 437 个,成立专业合作社 648 个,90% 以上的村民进入各类产业行业协会。

3、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承载平台进一步拓展。坚持把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作为“四化”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强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在市域范围内,先后完成投资近 60 亿元,重点构建“八纵六横三环”道路交通网络,打通“主城+新区”组团式城市层级间的连接。到“十二五”末期,“主城+新区”城市组团基础设施覆盖面积将达到 200 平方公里。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六网”工程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路的基础上,将村级公路向农业产业基地延伸,公路密度居全省第一,农村客运通村率达 98%。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全市所有 21 个乡镇 65 万居民喝上与城区同网同质的自来水。推进城乡一体的电网改造升级,建成 7 个电气化镇和 90 个电气化村。推进电话、电视、互联网“三网融合”,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 99%,有线电视通村率达到 95%。推进农超对接,引进武汉中百、中商等商家在鄂州农村开设 85 个直营店、加盟店,每个新社区都建有农家超市。开展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五城同

创”,营造畅通、靓丽、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深入实施“清洁乡村”工程,建立城乡一体的垃圾收集、污水处理系统,实现城乡垃圾、污水全收集、全处理。今年全市 12 个农村新社区荣获全省第二批“宜居村庄”称号,数量居全省前列。

4、坚持民生优先,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均衡。突出共建共享和保障民生的制度性安排,切实念好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八字经”,推动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构建更完备的教育体系,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打造更完善的医疗体系。建立免费培训、免费职介等就业普惠制度,重点加强进城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14.7 万人。实施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等就业扶持措施,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3.1 亿元,担保贴息 2540 万元,扶持带动就业 3.9 万人。提供公益岗位,实行托底安置,帮助困难人群和零就业家庭就业。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城乡教育布局,逐步将全市农村中小学由 240 所调整为 103 所,投入 1.7 亿元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完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网合一”运行机制,综合参保率达 99.4%。在全省率先实现大病医疗救助全覆盖,引入商业保险,实行二次投保。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养老制度全覆盖,新农保参保率达 91%。建立普惠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在梧桐湖新区探索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全市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深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市直四家公立医院全部实行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推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实施医疗资源倍增工程,筹资 7 亿多元改善公立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市区两级财政投入 6600 万元,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建设。

二、创新城乡一体化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政策建议

(一)创新城乡一体化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创新城乡一体化体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从本质上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运作逻辑就在于,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在占当时中国少量人口的城市和绝大部分人口的广大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公共制度鸿沟与壁垒,形成城乡分割的一条制度约束链条。这些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分割的财政体制。自2000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难得的良好局面。但是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财政体制依然存在缺陷。农村税费改革后,直接税费负担转变为流转税、增值税进项税、土地收益转移等隐性税费负担。由于现行税制原因,农民承担的流转税大部分被征入城市使用,农民不缴纳增值税,又使得农业投入的进项税全部由农民承担。按照发展中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10%-20%的标准,我国对农业投入规模仍然偏小,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仍然不足,并且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并没有都用于三农,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从鄂州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到,财政支出更多投向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改善,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并没有改变长期短缺的现实,农村居民从财政得到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

2、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我国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的确立及其延续是服从服务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尽管户籍制度及一些相关具体规定不断调整,但全国范围内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尤其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从鄂州的改革实践看,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改革实质进展不大,因为这样做并没有解决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上面的差别。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和所产生的问题充分反映了改革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通过社会管理的改革

与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解决好流动人口在就业服务、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3、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则归国家所有,它们受制于不同的权利体系并由分立的机构和法规管理。在这种制度下,农地要转化为城市非农用地一概须经过城市当局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先将土地由农村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然后由政府再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城市的土地使用者。无论土地被作为公共目的、准公共用途,还是明确作为商业用途,都是如此。这样,城乡土地制度分割使农地所有者与城市开发商隔离开来,它们之间的土地交易须以政府为中介。在这种隔离的制度下,失地农民得到的土地征收补偿通常只相当于政府出让这些土地价格的十分之一。因此,总体来说,在城乡土地制度分割的条件下,城市化没有给农民带来福利的改善,反而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贫困。

4、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制度性差异。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提供也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倾向。农村公共产品资金供给的不足必然引发两种问题:一是农村公共产品“缺位”,即政府忽略了一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农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或多或少都能从社会保障制度中获益。二是公共产品资金负担不合理,一些在城市无偿或低收费提供的路灯、自来水系统、九年制义务教育等公共产品,在农村却要由农民承担绝大部分费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客观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也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二)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规划建设等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其根本途径是通过体制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保障体系。

1、投融资体制改革。坚持“少取、多予”方针,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力度,同时发挥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社会各方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健全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支出的稳定增长机制。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特别是对主导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设施条件、教育资源等方面更要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建立财政对农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确保每年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高于上年、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高于上年、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高于上年。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的投入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土地出让金、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土地收益用于农业农村部分的足额落实到位。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探索设立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直接为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出台相关规定,吸引各商业银行将一定比例的信贷额度投放于城乡一体化建设领域,政府根据情况进行奖励或对因此而带来的利益损失适当补贴。大力引导资金回流农村,服务城乡一体化建设。探索创新符合农村需求的信用新模式。推广实施“行业协会+联保基金+银行信贷”、“龙头企业+种植基地+行社联合+财政贴息”等信用新模式,引导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入。

(3)搭建投融资平台。探索建立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和新农村建设投资公司,分别担当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项目主体,承接向国

家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融资贷款,组织实施国家政策扶持项目,对优质农业产业化项目进行引导性投资、鼓励性投资或风险投资,充分发挥政府投入对启动社会投资的杠杆作用,努力形成政府推动、多元投资、市场运作的资本经营机制。引导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把机构网点和信贷业务向乡镇覆盖,推动地方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将机构网点和信贷业务向农村全面延伸。

(4)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特点的担保抵押方式。建立区域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各类信用型、商业型和互助型担保机构。开展涉农信贷担保业务,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乡村房屋产权、林权、合作组织股权等多种形式的抵质押贷款方式;推行农户联保、农户互保等多种信用保证方式,有效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做活农业保险工作,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2、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改国家征用为市场购买,建立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征地价格的机制,充分体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

(1)全面加快土地流转进程。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租赁、托管或代种、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土地流转的政策激励机制,研究制定统一的土地流转扶持政策。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积极探索通过市场调节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程序和办法,开放集体土地产权市场,开展“五权两指标”交易,保障农民对土地用途改善后的收益分享,让农民共享土地出让的增值。

(2)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新安置办法。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宅基地置换、公寓式安置的途径,使农民低成本进入农村新社区、城镇居住生活。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区域的村庄实行宅基地置换改革,农户宅基地撤并后居住向社区集中,原农户宅基地由政府收回后复垦

为耕地,并按照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将置换形成的增量土地用于除农民居住安置以外的经营性开发,其土地增值收益优先用于置换成本。通过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节约土地资源,腾出建设用地规划空间,将多余土地和规划空间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完善以养老保障为主要方式与就业市场化相接轨的征地补偿制度。深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完善安置政策,逐步提高被征地人员安置标准,建立土地出让增值的共享机制。将规划用地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被征地人员安置标准,逐步消除与城镇居民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差距,使之享受同等待遇。

3、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恢复户籍制度的本来面目,取消一切附加在户籍上的其它功能,使户籍制度真正成为反映公民身份、提供人口数据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让农民真正拥有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权和公共服务权。户籍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

(1)建立新的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就业条件差别的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和人为规定。

(2)取消城镇入户限制条件,以实际居住地将人口划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并统一登记为居民常住户口。凡在城市、城镇拥有合法固定住所,具有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在实际居住地登记为城镇居民户口,享受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3)加快农村劳动力就业体系建设,建立城乡结构相符合的劳动力就业体系,加速发育全国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使进城农民不仅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政治自由权利,而且与城镇居民同样享有在基础教育、职业培训、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服务,享有同等的自由选择职业和工作的权力,让农村劳动力参与就业竞争,以便农村劳动力的流

通和转移。

4、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构架涵盖“一系统、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学、贫有所济、弱有所助。“一系统”指社会救助系统。要建立农村低保、“五保户”集中供养、农村灾民救助等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低保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全面落实优抚政策,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逐步建立健全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以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救助相配套的社会救助体系。“三制度”指合作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1)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筹资标准,进一步提升参合率和参合农村居民住院实际补偿比例。全面落实农村医疗救助政策,实现农村医疗救助对象全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借鉴鄂州改革经验,将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网合一”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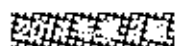
(2)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健全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财政投入运行保障机制,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

(3)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规划用地范围内的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被征地农民“即征即保,先保后征”的刚性工作机制,健全培训、就业、保障“三位一体”工作体系,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正常增长机制。

(4)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内容,尽快将农民工纳入到职工医疗、工伤、生育、住房等社会保险和城镇社会救助体系中去,让农民工像城镇职工那样共享职工社会保障。

(本课题为2013年全市社科重点课题,编号E2SK13SH020。课题组成员:傅宝山 廖金星 肖金鹏)

(责任编辑:李 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与突破

市委党校课题组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顶层设计与鄂州探索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与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之间的产品市场处在相互渗透相对放开的状况,城乡之间的要素非对等交换使得城乡反差更加明显。

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我国开始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应运而生。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成为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的重点对象。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各项政策相继出台,政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由原来比较狭窄的农业生产向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延伸,逐步把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乡村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农村能源等纳入公共财政支出。

党的十七届三中会全指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要求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争取基本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在以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保持了不断增长的投入势头。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鄂州实践与成效

2005年起,鄂州确立了“两个率先”的目标:率先融入武汉城市圈,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确定鄂州市为全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经过几年的探索,实现了“三年明显变化”的阶段性目标,初步形成了具有鄂州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特别是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基础教育: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向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家庭的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2008年开始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免费就学和补助政策同步落实到位。按“四集中”原则调整中小学布局。根据全市106个新社区的城镇布局,规划将全市农村学校调整为103所。通过新建、撤销、重组等办法,先后撤销了32所规模小、条件差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不断优化。投入危改资金总计2343万元,改造了106所学校的78735平方米危房。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重点扶持农村教育发展,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医疗卫生:鄂州是全国16个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城市之一,乘改革试点机遇,全面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同时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每人25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99.44%。加大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设备投入,对基本医疗机构在岗人员进行全科培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社会保障:实行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网合一”,城乡居民参加医保可选择、可衔接、可转换,综合参保率99.4%。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建立普惠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将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供应范围。

基础设施:强力推动城市交通、供水、供电、信息、供气、市场等基本设施向农村延伸。全市320个行政村全部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公益电影放映惠及城乡,在市域159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通村、通农业基地的等级公路达1300公里。2011全市建成通村公路达到926公里,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达水泥路。2011年筹资1亿元投入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至今仍在不断投入,强力推进清洁乡村等工程。

二、鄂州模式的多维视角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

(一)鄂州模式的特征

1、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

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是中国改革模式的一大特点,鄂州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主动性更强,契合性更高。一是宏观层面上积极落实自上而下地推进项目。二是结合地方实际,自主创新项目。三是上下共建项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鄂州先后承担了36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鄂州结合地方实际,自主探索的项目比较多,很多方面走在前列。教育方面,在加快城乡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基础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学校教育质量均等化,让全市学生享有同质的基础教育。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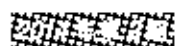
年葛店开发区撤销乡镇政府,组建功能区,逐步将区以下管理的学校、医院上划市级管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市级统筹、标准统一。在公共服务执行机制方面,以BT、BOT、TOT等办法,同时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在政府与居民边界层面,探索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1+8”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将33项公共服务沉入社区,基本实现群众办事不出社区。

2、自主发展与“厅市共建”相结合

为支持鄂州城乡一体化试点,湖北省专门建立了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直“鄂州市城乡一体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鄂州市开展“厅市共建”。“厅市共建”模式,向上借力,向外借脑,省直部门与挂点村进行“一对一”共建,在项目上倾斜、资金上扶持。“厅市共建”机制既将上级财政公共资源以项目制方式落到实处,又克服了现行体制下项目制的条块分割弊端,使公共资源在市级范围内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一安排进行了全域整合,实现了公共资源的集约化、高效化。

3、经济发展与综合改革相结合

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560亿元、32.58亿元,分别增长12%、23.8%,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基本保障。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鄂州在加大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领域等五大方面,大胆先行先试,推进综合改革。其中,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扁平化改革,城乡新型社会网格化管理改革,变管理为服务,理顺政府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同时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真正前置于政府公共服务,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为城镇化和人地关系的协调均衡创造条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下,促进城乡资源合理流动,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使得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式下实现经济发展与体制机制的良性互动。



(二)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1、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保障能力方面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取决于财政保障能力。根据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临界关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输入型均等化,二是自给自足型均等化,三是对外贡献型均等化。鄂州作为中等地级市,用于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二是财政转移支付。

2011年鄂州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6.31亿元,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排名第226位,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06元,在全省16个市州中排名第3位,但是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低于16个市州的平均水平。长江沿岸23个主要地级城市中,鄂州在人均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排名第14位,比平均值4137元低1631元。

从全口径的收支情况看,2012年鄂州市财政总收入达到50.61亿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2.68亿元。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和全口径收支规模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鄂州市的财政保障能力还是处于欠发达状况,属于公共服务输入型均等化之列。从市内所属区乡镇的财力状况来看,输入型均等化的特点更是明显,这也是鄂州处于输入型均等化的主要原因。

2、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体制机制方面

从宏观到中观乃至微观的考察,我们发现要求财权与事权,甚至财力与事权相配比的政策诉求是不切实际的,相关理论解释的说服力也不强。因为严格来讲,地域性财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地域是不可能完全对称的。也正因为财力来源与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不对等,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总体上有极大的合理性。就鄂州而言,虽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地方财力满足公共服务仍显不足。由于区域差距的客观存在,全域性公共产品的穿行原理才能更好解释当下中国多重二元差异下的均等化问题。公共产品的穿行特征是公共产品的本质所在,也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义。根据调查,我

们也发现现行分税制体制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除税收返还的转移支付外,历次增加工资、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等沉淀性的专项转移支付较多,真正从总体体制缺口考虑的一般综合性的转移支付欠缺。

因此,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必须继续依赖分税制财政体制,另一方面也必须改革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3、均等化进程中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方面

就农村而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正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问题也比较严峻,为了解决农村公共环境治理和养老保障等相关问题,公共服务项目会增多,公共服务的标准也会提高。特别是随着城乡发展中人地关系的空间调整,学校医院需要跟上人口转移进行重新布局。而从全域视角,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看,在鄂州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最终需要以农民市民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成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

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鄂州市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2.09%,而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方向要与农民转移过程中的公共需求相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投资要更加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规律。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民转移过程中的新生需求,会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替代农村的部分投资额会更大,将再一次考验统筹城乡的财政供给能力。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完善路径与策略选择

(一) 完善政府间分税制财政体制

我国实行的分税制对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起到了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分权必然受(下转第53页)

鄂州市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时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为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现代农业是由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支撑的农业,信息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之一。发展现代农业,在生产条件控制、生产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传递、动植物疫病灾害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农业生产指挥调度等方面都离不开信息技术。抢抓机遇,加快鄂州农村信息化建设,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本市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鄂州市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

(一)发展成果

1、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鄂州广电在农村电话、宽带和电视方面大力铺设管道,建设基站,安装线路,并大力推广,采用免费及优惠给农户安装的形式,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其中电信电话接入9万门,宽带接入5万户。鄂州广电还建设了数字图书。

2、人才储备:市科技局组织成立了农技专家协会,包括水产、林业、畜牧、蔬菜等四个协会,专家有3000多人,其中有4名农技专家入选全省农业科技“双十佳”专家,2名被省科技厅授予“双十佳”专家称号。

3、信息发布:通过网站、短信、电话和简报的形式,满足农民的信息需求。如市农委建立了鄂州农业信息网,市科技局建立了鄂州科技网,市蔬菜办建立了鄂州蔬菜信息网,市畜牧

局建立了鄂州畜牧信息网等,移动有手机短信服务“农信通”,电信有三农服务热线“12316”,农委定期发布《农业简报》,通过农技服务中心传达到农民手中等,鄂州广电还建设了数字图书,农民可通过电视点播,收看各种农技信息。

4、管理:设置了一些为农民提供农业信息资讯和服务的机构,如市农委有农技推广中心,下属三站一校(种子、化肥、植保站和农民夜校)。在每个乡镇有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配备农技服务人员,如我市科技局先后成立了一个市级工作室、三个县级服务中心、15个乡镇服务站等。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农村信息化建设存在多头管理,重复建设,资源分割

如市经信委、市农委和科技局等部门都对农业信息化建设负责,负责的部门多了,但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导致重复建设,资源分割,一方面由于经费不够,机构设置不健全;一方面在机构设置和人员使用上却存在重复和浪费。如农委在乡镇设有农技服务中心,科技局在乡镇也设有服务站,科技局有农技110热线电话,农委也有12316农业信息服务热线等。

2、涉农信息的采集渠道不畅

主要表现在信息的采集和发布之间的链条出现断裂,农民的需求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采集,农民想得到的信息和信息发布者发布的信息之间不能匹配,信息有效率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经费困难,机构设置不够,

设备及人员缺乏,没有稳定广泛的信息采集点,没有统一的信息采集规范及报送制度,从农民手中直接采集信息的难度比较大,信息发布者只有根据经验或层层统计结果进行信息发布。

3、农村信息化建设区域发展还不均衡

主要表现在离城比较近的及城乡一体化建设好的区域发展较好,如鄂城区,离城远的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慢的区域发展较差,如梁子湖区。主要还是和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及机构人员配备程度以及经费投入程度相关。

4、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还不够高

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信息化设备不齐全,互联网、电脑等信息化手段使用不够,WIFI、远程控制等技术更是少见,使得信息的传递速度及效果大大降低。农村专业信息库建设滞后,如各部门发布的涉农信息多是农技知识等静态信息,动态信息如市场行情,供求等信息及数据库尚不足,使得信息内容不够丰富。

二、对策建议

1、加强统一管理,建立联合推进工作机制

成立市级领导担任组长,相关部门与单位为成员的“鄂州市加快农村信息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全市农村信息化建设,制定有关实施意见,协调解决农村信息化接入点建设过程中征地、供电、赔偿等问题,简化审批手续,实行特事特办,不断降低建设成本。

2、实施示范工程,带动鄂州农村信息化快速发展

组织建设“农村信息化示范点”、“农村信息化示范区”。对达到示范标准的点和区,由政府分别授予农村信息化示范点(区)称号。

3、继续加大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将农村信息化建设纳入鄂州市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农村信息化基础网络建设应采取以“村村通工程”为基础、以农村党员远程教育为契机、“多网合一”综合建网的方式来推进,满足农村地区的宽窄带综合通信需求。

4、加快推动涉农信息资源整合步伐

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当前分布在各部门、各

地区的涉农信息资源,建立统一共享的信息资源库。可建立鄂州市农村发展综合服务网络平台,将农村电子商务、信息发布、行业指导、信息采集、政策法规、农技服务、人才培养及求职招聘等功能整合在一起。可以将农村信息服务纳入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网络管理员的职能,通过社区统一对涉农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及发布等。

5、加强农村本地信息的采集和加快整理工作

建立各类农村信息数据库,建立信息采集指标体系和报送制度,通过远程联网等多渠道采集信息、报送农村各行业和领域的生产动态、供求变化、价格行情、科技教育、自然灾害、动物疫情、农民收入、社保、医疗卫生、质量安全和资源环境等信息,提高涉农信息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鄂州职业大学。本课题为2013年全市社科重点课题,编号EZSK13 SH031)

(责任编辑:徐喜元)



国画 徐文峰

试论古噩国及“鄂”文化的相关问题

——兼论鄂国与商周王朝、楚国的历史渊源

市博物馆课题组

近年,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发掘大批商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众多极具历史、考古价值的文物,越来越多的文物填补了其中一些时段的历史空白。本课题组正是基于这些新的发现,结合文献、典籍、对“鄂”国和“鄂”文化深入研究考辨,证明今鄂州与古“鄂”国和“鄂”文化有传承关系,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古噩国及“鄂”文化的相关问题,文史界与考古界的一些前辈、同仁曾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征集、出土的部分噩国青铜器及青铜器铭文等资料中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与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①。这些成果对进一步综合完整的分析、深层次的解剖古噩国及“鄂”文化的形成、演变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文献对古噩国历史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尤以西周晚期至东周中期历史链条缺失最为关键,加之建国以后数十年考古发掘工作很少涉及噩国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早期城址)、墓葬等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使古“噩”国及“鄂”文化的“脉络”问题成为“难解之谜”。

一、文献、典籍和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鄂国及噩、噩、鄂、鄂、鄂部族(国名)的演变产生与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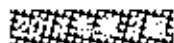
1. 鄂国的形成、发展壮大与消亡

典籍中的鄂、噩、鄂等,金文中写作噩,是由一个部族逐渐形成壮大而产生的国名。商周之际,它的君主具有侯的爵称,其地位比楚国国君还要高。鄂国的爵位称侯、叔、季,可知其族

有侯、叔、季三支。它在商王朝时期是雄踞南方的一个侯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史记·殷本纪》记载:“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

西周前期,噩国的君主为侯的爵称,其国力和地位远远高于南方的楚国。从青铜礼器《噩侯驭方鼎》^②铭文记载得知:周(厉)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到祛的地方,噩侯驭方献礼并宴享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周王亲自赏赐鄂侯玉、马、矢。驭方拜谢周王,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从这篇铭文分析得知,当时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噩国,因而亲自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器以示纪念。

西周晚期,周王室日渐衰弱,噩国的力量不断发展强大。由于噩侯率南淮夷、东夷叛周,被周扑灭,噩国就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从宋代和1942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两件形制、铭文基本相同的噩国青铜器《禹鼎》铭文:“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六或、厉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扑伐噩侯驭方,勿遣寿幼……”^③这段铭文可知分析,大约在噩侯驭方所记于祛地恭迎周王并受周王赏赐之事不久,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出现了逆转。《禹鼎》铭文的记载证实,噩侯驭方向周王室发动的这次反叛活动,



声势是很大的。他不仅动员了本国力量,而且率领南淮夷、东夷,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周的南国、东国进攻,并一度取胜,抵达“厉内”。这一行动引起了周王室朝野的恐慌,因而铭文记载中出现了“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的惊叹。周王不得不动用精锐部队西六师殷八师征讨。周人虽派大军压境,却迟迟未能获胜,故又命武公派遣禹率百乘之师前往督军助战。《禹鼎》铭文中两次强调了周王关于“扑伐噩侯驭方,勿遣寿幼”的命令,足见周王决意剿灭噩侯驭方与南淮夷、东夷发动的这次叛乱,这次战争最终以俘获噩侯驭方结束。这一结果,对周王朝来说,不仅打退了进犯,也铲除了南方的一个心腹大患;对噩国来说,因周王下令“勿遣寿幼”,噩国公室的老老小小,大概在这次战争中被斩尽杀绝,或者被周王朝进行了监控,噩国从此逐渐消亡。此后,噩国不再出现于史籍,青铜礼器中也未曾见到比《噩侯驭方鼎》、《禹鼎》等这一时期年代更晚的铜器了。

2、鼃、噩、鰓、𩺰、鄂字(部族、国名)的产生、演变与鄂国的迁移。

据有关资料记载:夏商周时代,鰓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一带。历史上这些地方属于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气候适宜、草泽繁茂,最适合于鰓的生长与繁殖。鰓,又叫鰓、鼃、鰓、单、土龙(蛟龙、鼈龙)等,即现在的扬子鰓。一个以捕鰓为生,且以鰓为图腾的部族,便以鰓为部族(国名)名称,在商代时形成了噩国,地点在今山西省乡宁县。西周初年,鄂国的故地被晋所并,遣族南迁到河南南阳及湖北随枣走廊一带,仍叫噩国。1976年、2007年、2011年至2013年在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浙河镇蒋寨村叶家山前后清理发掘的部分西周早期墓葬中所出土的标明为“鄂侯”所用的青铜器所证实。西周中叶,南方的楚国逐渐发展强大,因受到楚的威胁,鄂国又南迁到长江中游,今湖北鄂城一带,国名仍称噩国。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7],封其中子熊挚红为鄂王,不久,鄂国被熊渠所灭。随后,即春秋战国时期,史称“东

鄂”。近年来,随着考古不断发现和发掘出土的鄂国青铜器等文物,非常有必要去系统整理、研究鄂国历史和文物状况。

鼃,是世界上现存二十多种鰓类中的一种,它的属性共有两个:一种叫美洲鼃,又叫密西西比鰓,栖息于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种叫中国鼃,又叫扬子鰓,现栖息于长江(扬子江)中下游。

商代早期的甲骨文,鼃字写作字^[8],到了商代后期,甲骨文简化为、、、、。在周代的金文中,有“鼃”字,或简化为、、。“鼃字,象其头、腹、足、尾之形”。

鼃,音鼃,与鼃通用,古代因鼃字复杂难写,以后又转简化为粤字。这些方言主要流传于山西南部,随着噩国的迁移,便将这个方言也带到了长江流域。

卜辞中有“亡于南单?……”^[16],南单在今河南安阳漳水之滨,可见这里古代有单。单以后引伸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噩字。“据罗振玉曰:辞中噩为地名,殆即噩侯国。”……郭沫若曰:“噩同鄂,殷末有鄂侯。……”卜辞言:“辛丑卜贞,王伐于噩。”^[17]金文中的噩字写作 (《噩侯簋》)一字四口,象征着为多口发出的响声,即以后的噩字。这些已见的鼃、噩、单的甲骨、金石文字,不但是物名,也是因产地而命名的国名和邑名。

噩字后来加鱼旁,又写作鰓,即扬子鰓,鰓音为鄂,正是鼃的叫声,故用以称呼这种动物。商代甲骨文的噩,又写作𩺰,是一个侯国,见于《成鼎》铭文,系“古代的氏族,姓,殷代诸侯的后裔”^[18]。《史记·殷本纪》云:商纣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国是商代的一个强盛的方国,亦称为噩方,才能任商朝的三公,与西伯姬昌并列,故此,甲骨文中有很多“噩侯”的记载。例如:“贞,令口从噩侯伐儿方受之口”、“口口田,口贞,令方口从噩侯寇周”。郭沫若以为噩地在今河南沁阳县,似为欠妥,但释“噩”为地名(或国名)是正确的。吴泽称“噩地,有谓春秋时晋地之鄂。”^[19]。此说一语中的,符

合历史史实。

经考证,属于西周早期的《季子白》铭文里,有“噩侯弟季作旅彝”。这个噩侯国,在周代仍为侯国,它的国名,系由号(噩)图腾崇拜发展成为国家,或因擅长捕鼯而叫噩国。

噩国最早的所在地,当属现在的山西省乡宁县,《清一统志》卷九十九平阳府引“《括地志》:‘故鄂城在慈州县宁县东二里’。县志:今谓之鄂侯故垒(垒)”。昌宁县即今乡宁县,这是根据《左传》隐公二年所说的鄂侯故里而来的,直到清代这个古迹还存在。

《噩侯季父簋》与《噩侯弟季簋》形制相似,从铭文看,“噩侯弟季”与“噩侯季父”,之间不排除是同一个人的可能,因为前者自铭为“噩侯弟季”,后者铭“噩侯季”。噩是国名,季是伯仲叔季之季,父是他的字。“噩叔”之称,叔字是伯叔之叔,也是噩侯之弟,而且是季之兄。显然,他们的兄长就是一代噩侯了。因此,上述诸器,除了说明西周早期噩国君主有侯的爵称外,还说明了这一代噩侯至少有兄弟四人。

西周中期的《噩侯驭方鼎》、《叔噩父簋》铭文记载有周厉王南征淮夷的途中,噩侯驭方觐见厉王,得到了优厚的礼遇。鄂临近东面的淮夷,周厉王时期为了牵制淮夷,便结好于鄂,动员他参加了伐南淮夷,可见鄂在周中叶时仍为强国。1976年8月湖北随州安居镇羊子山出土一件青铜单把尊,铭文有“鄂侯弟季作旅彝”,与《季子白》铭文相同,为西周中期的器物^[24]。随州位于河南南阳之南不过百余里,此器应属于迁至南阳之鄂国所铸无疑,即为以后鄂国又南迁随州、鄂城、大冶中途遗留之物。此器的出土,为进一步探讨鄂国由南迁到江南所经过的路线提供了实物佐证。后人因“江夏有鄂,故加西也”^[25],即加一“西”字,史称“西鄂”,以示区别。称湖北鄂城之鄂为东鄂。吴大澂《驭方鼎释文》云:“噩与粤、鄂为一字,……盖噩为粤、鄂之古字,故仅见于《周礼》、《尔雅》也。”

鄂国铜器中的《噩侯弟季簋》、《噩侯季父簋》,这里被称为鄂叔和季、季父的人,当是鄂侯之弟辈。又《噩侯簋》铭云:“噩侯作王姬媿

簋,王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可证实周夷王之时,噩侯曾一度与周王室联姻,这从王妣之称可以证明鄂为姁姓。正因为周、鄂联姻,所以周夷王倚重噩侯以镇定南淮夷诸国。故《噩侯驭方鼎》称周夷王征南淮夷途中与噩侯驭方宴乐酬答的情景,赐之以“玉五毂,马四匹,矢五束”的优厚礼遇,这在鄂国铜器铭文中记录此种赐命场合内容实属罕见。

以上之事过了不久,噩侯驭方胸怀壮志,但行动上却阳奉阴违,等到周夷王回军后,便勾结南淮夷、东夷起来叛乱。据《召禹鼎》铭文记载:“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芮。”鄂侯已成为南淮夷及东夷的盟主,向东方及南方诸邦国扩张领土,到了历(河南禹县)、芮(陕西芮城县),大有打回老家乡宁的态势。这种规模较大的扩张进攻战争,极大的威胁了周王朝的统治,于是,周夷王又亲率“西六师、殷八师”征讨,并下令“伐鄂侯驭方、勿留寿幼。”这十四个师都是周朝的精锐军队,同时,周王的亲族虢武公也感到鄂侯已兵临城下,因芮正是虢(现三门峡市)的西邻,便急派大夫召禹率“公口车百乘,口御百,徒千”,去协助周夷王讨伐鄂侯驭方,“至于鄂墉”,攻破鄂都,俘获鄂侯驭方。

鄂国遭到周、虢联军的沉重打击以后,蛮族被迫沿汉水及随枣走廊南逃,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国青铜器尊正是鄂人携带其铜器南逃时遗留下来的物证。沿着这条线路,鄂人一直南逃到今湖北鄂城、大冶,这里在周代时山林茂密,川泽交错,湖泊众多,地下蕴藏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属于尚未被开发的地区,盛产鼯更多,且北依长江和梁子湖与九十里长港,是周朝兵力所难达到的,正是鄂人最理想的天堂之地。

鄂人由南阳、随枣走廊一线南迁到湖北古鄂城,其原因除了受周朝的毁灭性打击和楚的威胁以外,还因故地南阳之鄂,这一带先后曾建立过申、吕、谢、唐、蓼、郛、鄆、邓、厉等国,人烟密集,土地已经基本开发,导致鼯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鼯便急剧减少,以渐归绝灭。这个

以捕鼃为主要生活来源的鄂国人民,当然也感觉到生活物资的困乏,一种传统习惯性的捕鼃技术无处施展,不得不寻找多鼃的地区而进行迁居。湖北的古鄂城是一个最理想的迁地,这里青面有长江和梁子湖等九十九湖,江北有张渡湖、柴泊湖、武湖等一连串的湖泊,城址的东南端又有上邹山、尖角山等自然山林,又位于古云梦泽的东头,到处一片水乡泽国,芦苇竹林密布,正是多鼃之地。梁子湖因鄂人迁居于湖畔,故名鄂渚,即《楚辞》所指的鄂渚。而南阳的鄂,汉代建为鄂县。

姓氏鄂国迁到湖北鄂城不久,正好是楚国熊渠的势力强盛;大力向长江中游的发展时期。《史记·楚世家》说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最后灭掉鄂国,封他的“中子红为鄂王”。《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后改鄂城县,鄂王城遗址所在地于解放后划属大冶西畈李角村。《正义》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之子神也。”熊渠灭亡鄂国,仍以鄂为地名,从此姓氏之鄂侯,逐渐被丰姓之鄂王所取代。即《吴越春秋》卷九“所谓句章、鄂、章、人号康侯、翼侯、魏侯也。”鄂侯又别称翼侯,因翼乃商代鄂侯之辖地,在今山西翼城县,也是晋鄂侯的故都。这里将鄂称翼,更说明它是从山西的古鄂迁到河南的鄂,再迁到湖北的鄂。《鄂君启节》中的鄂已加了邑旁,成为楚国的城邑。秦以鄂邑建为鄂县,隋升鄂州,以后鄂州治所迁到今武昌,元置湖广行省,省府设于武昌,明、清、民国因之,鄂州、武昌便成为湖广行省,湖北省的省会,以后便成为湖北省的简称,叫“鄂”。

二、从建国前后征集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噩国青铜礼器,探讨噩国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

建国前后,特别是近十余年以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发现以及史学、考古界对鄂国历史和鄂国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噩国的历史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截至目前,已知征集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噩国铜器数量愈来愈多,明确为噩国青铜器的种类及铭文记述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对研究噩国历史及青

铜器的序列,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下面拟就这些铜器为素材,对涉及噩国历史及其青铜文化的相关问题试作探讨。

1、“噩侯弟卬季”青铜器,初步统计共有三件:

簋,1件。圆口,双耳,口沿下端饰一周雷纹。圈足,盖已失落。器物内底有铭文二行“噩侯弟卬季自作(作)段”共八字(参见《殷商金文集成》6·3668)。

卣,1件。圆状钮盖,鼓腹,圈足,无提梁。腹部有一罍,饰有平行弦纹。盖及器身铭文相同,“噩侯弟卬季乍(作)旅彝”二行八字(参见《殷商金文集成》10·5325)。

尊,1件。器底近椭圆形。大侈口,长颈,垂腹稍鼓,圈足。龙形兽首罍。腹,圈足分别饰四周和一周凸弦纹。器内底铸铭文二行“噩侯弟卬季乍(作)旅彝”共八字(参见《随州出土文物精粹》24·30)。(图一)

2、“噩侯侂父簋”1件。圆口,双耳,口沿下端饰雷纹、兽面纹,圈足,盖已失落。器物内底铸铭文二行“噩侯侂父(作)宝彝彝”八字(参见《殷周金文集成》6·3669)。

3、“噩叔簋”1件。四兽首耳,浅腹,高圈足,下有方座,座内系铃。圆口,口沿下端圆涡纹和雷纹,圈足为兽面纹,方座饰鸟纹,器内铸铭文二行“噩叔乍(作)宝尊彝”六字(参见《殷周金文集成》6·3574)。

上述五件青铜礼器(簋3、卣、尊各1),器物形制和花纹特征相近。方座簋是西周初年出现的器形,最早为武王时期所铸之利簋。噩侯弟卬季簋与噩季侂父簋的形制相似,噩叔簋与宜侯



图一:噩侯弟卬季尊



矢簋又相类似,经考证,其时代约为周成(王)康(王)时期,即年代为西周早期。

从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噩侯弟厯季簋》、《噩侯育父簋》,这称为噩叔和厯季、季育的人,当是噩侯之弟辈,他们之间不排除是同一个人的可能。因为前者自铭为“噩侯弟”,名厯季;后者名“噩季”,噩是国名,季是伯仲叔季之季,父是他的字。“噩侯”之称,叔字是伯叔之叔,也是噩侯之弟,而且是噩季之兄。显而易见,他们的兄长就是一代噩侯了。故此,上述铜器,除了说明西周早期噩国君主有侯的爵称外,还证明了这一代噩侯至少或可能有兄弟四人。

4、铭文铸有“叔噩父”字样的青铜器共六件:

“叔噩父乍(作)姬旅段(簋)”4件。四器形制相同,圆口,口沿下端有对称的兽首耳,耳上系有圆环。整器通体饰有横向平行瓦纹。带盖,盖为圆钮桃形。盖、器身均铸有铭文,器盖铭文:“叔噩父作姬旅段,其夜用享孝于妣,其万年永宝用”;器身铭文:“叔噩父作姬旅段”(参见《殷商金文集成》7·4058等)。

匜,1件。形似虎头匜,器内铸铭文为:“叔噩父作姬旅段匜”(参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

鼎,1件。自铭为“鼎段,不知为何种器类。器内铸有铭文三行“叔噩父作姬旅段,其夜用享孝于妣,其万年永宝用”(参见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

从以上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综合分析比较,应该均为叔噩父为姬旅段所作,后者则应该是他的夫人。这一组器皿很有时代特色,簋为通体饰瓦纹的桃形簋,腹部上端有对称半环耳,耳上系有大圆环,为恭、懿王时期很有特点的器形,年代为西周早中期。

5、“噩侯簋”(又称“鄂侯簋”)共4件。形制基本相似,圆口、双耳、圈足(盖已失落)。口沿下端和圈足饰鳞纹,腹饰瓦纹。四器铭文内容相同,共二行“噩侯作王姑朕簋,王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十八字(参见《殷商金文集成》7·

3928等)。由此可知,这是噩侯为女儿王姑所作的膳器。噩侯之女称“王姑”,王字应指周王,姑则为姓,可以证实周夷王时,噩侯曾一度与周王室联姻,“王姑”之称证明了噩为姑姓,正因为噩与周联姻,故周夷王则倚重噩侯镇定南淮夷诸国。这从《噩侯驭方鼎》的铭文内容中反映出来,详情将在下文中叙述。

6、“噩侯驭方鼎”1件。器体较大,圆鼓腹微下垂,底缓平。三蹄足根部饰兽首纹,口沿下端及腹部饰有回首曲尾的夔龙纹带。此鼎的年代,五十年代前后,郭沫若、容庚和吴其昌将其定在周厉王时期,似都偏晚;唐兰将其与“噩侯作王姑簋”并列为周穆王时所作,则又定为偏早。

从此鼎的形制、花纹的时代特征与“禹鼎”比较,则比“禹鼎”略早,其年代应为恭、懿王时期。该鼎的铭文字数较长,且内容亦相当重要。铭文为:“王南征,伐角夷,唯还自征,才祛。噩侯驭方内于王,乃受之,驭方休王。王休,乃射。驭方王射。驭方休,王宴,成酉。王窥易驭[方玉]五穀、马四匹、矢五束。驭[方]手,取[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作]鼎。其万年子孙永宝用”(参见《殷商金文集成》5·2810)。这篇铭文内容的大意是说:周夷王南征角夷,自征地返回到祛的地方,噩侯驭方献礼并宴享周王,又陪同周王行射礼。王亲自赏赐之以“玉五穀、马四匹、矢五束”的优厚礼遇,驭方拜谢周王,并作此宝鼎,留给子孙后代。

从上篇的铭文分析,当时噩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因而在周王征伐角夷的返回途中,噩侯驭方亲往祛地恭候迎接,献礼设宴。周王显然也很重视噩国,因而亲赐驭方财物、弓矢、马匹。噩侯驭方也以此为荣,作器以示纪念。

7、随州安居羊子山 M4 出土的噩国铜器。2007 年 11 月,随州市博物馆在安居镇羊子山抢救性清理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噩国墓葬,编号为 M4。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有:方鼎、圆鼎、簋、甗、盥、盘、提梁卣、尊、罍、爵、方彝等共 27 件。这里,将铭文标明为噩国铜器的典型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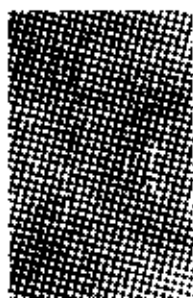


类予以择录:

①噩侯提梁卣。形制为椭圆体。隆盖,盖顶有一圆形提手。器身子口以承盖,垂腹,圈足,提梁两端各一兽首,与颈部两半环耳相连,梁饰雷纹为底的龙纹,盖面、口沿各饰一周兽首龙纹。盖内有铭文二行“噩侯乍旅彝”五字(图二)。



图二:噩侯提梁卣



②噩侯方彝。盖为单脊四坡屋顶状。器身方体,直口,圆肩,圈足。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半环兽首衔环耳。盖面、器口、器腹、器身、圈足四面中央及四隅均饰钩形扉棱。盖脊中央有一相向对吻的鸟形钮,前、后肩部正中有一张牙卷鼻的象首,两旁有对称火纹,盖顶四坡面和器腹四面均饰兽面纹,器口四面饰对称龙纹,圈足四面均饰一首双身龙纹。器体中央悬挂一铃,铃内有舌。盖内有铭文一行“噩侯乍厥宝尊彝”七字(图三)。



图三:噩侯方彝



③噩侯彝。隆盖,盖顶为一圆形提手。侈口,束颈,广肩附对称兽首衔环耳,弧腹内收,高圈足。盖面和肩部各饰一周以两道细弦纹为边饰的火纹。盖内有铭文二行“噩侯乍旅彝”五字(图四)。



图四:噩侯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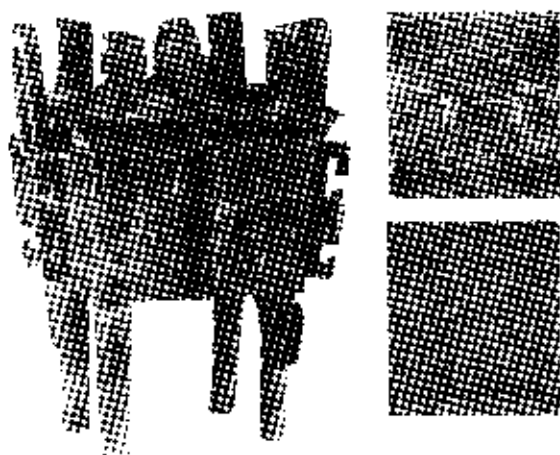


④噩侯盘。敞口,平折沿弧腹内收,圆底近平,高圈足外侈。腹部饰羽脊兽面纹,圈足饰二道平行凸弦纹。盘内底铭文二行“噩侯乍旅彝”五字(图五)。



图五:噩侯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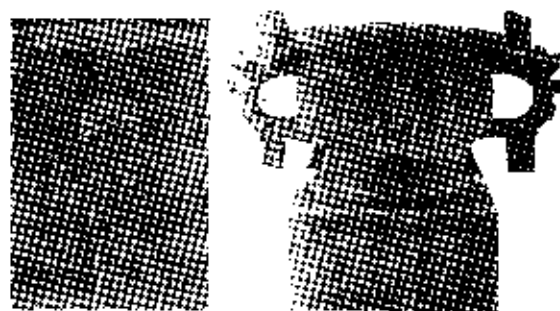




图六：噩中方盖顶

⑤噩中方盖鼎。长方形体。平盖，环形附耳，方折沿，深腹，平底，四柱足较高。盖面四角均有扁体倒立的龙形纽，中心有一宽带桥纽，纽下有一蝉纹，纽两侧以雷纹为地饰对称兽面纹。腹四隅、四面中心及足跟部均饰钩形扉棱，腹部及足跟部饰兽面纹。盖内有铭文二行“噩中乍宝璋彝”七字(图六)。

⑥双耳方座簋。侈口，鼓腹，高圈足下连方座。兽首半环形双耳，下有长方形珥，腹正中有两组对称的扉棱，圈足对称分布四个小扉棱。腹部和方座均饰满兽面纹，圈足饰龙纹，两耳由兽首、虎等纹饰组成(图七)。



图七：双耳方座簋

⑦四耳方座簋。直口微敛，方折唇，腹微鼓，高圈足下连方座。腹饰对称半环兽首形器耳，下有长方形耳，腹饰四个对称的火纹，间以龙纹，圈足，方座满饰兽面纹(图八)。

⑧直棱纹簋。侈口，鼓腹，半环兽首形附耳；下有勾形珥，底近平，高圈足。颈饰羽脊兽面纹，腹饰一周直棱纹(图九)。



图八：双耳方座簋



图九：直棱纹簋



图十：饕餮纹簋

⑨饕餮纹簋。侈口，鼓腹下垂，半环兽首形附耳，下有勾形珥，底近平，圈足较高。腹部饰浅浮雕饕餮纹，圈足饰夔纹一周(图十)。

以上随州羊子山 M4 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器体高大，铸造厚重，纹饰繁缛，时代风格除继承了商周文化的特征以外，还有噩国铜器的自身特点，且铜器铭文标明了为“噩”所作。这些情况表明噩国在西周早期确实是南方的一个侯国，地位是很显赫的，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可以与西周王朝分庭抗礼。

8、河南南阳夏馆铺噩国贵族墓地 20 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的发掘及出土的噩国青铜器等文物。2012 年 4、5 月份，河南南阳市

新区新店乡夏响铺,发现、发掘噩国贵族墓葬20座。其中,大型墓2座。编号为M1、M6,规格在长5米、宽4米以上,规格棺椁保存较好,椁板上有0.8-1.0米厚的青膏泥,其四周有二层台,墓口距墓底8米多深。中型墓8座。编号为M2、M3、M4、M5、M7、M16、M19、M20,发现有木质棺椁朽痕,规格长宽在4米左右,亦有青膏泥、二层台等。小型墓10座。规格长宽在2米以下,葬具不明显,随葬品无或一件陶器。

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等级清楚,墓主人身份明确,随葬品丰富、齐全。

M1。墓口南北长6.40、东西宽5.30、距地表8米多深。虽然被盗,但通过清理,发现有青铜鼎9件、7件鼎形制、纹饰相同,应为列鼎中的7件,其中6件有“噩侯夫人”铭文,发现的2件铜簋盖、3件铜鬲,在盖及鬲口沿上亦见铸有“噩侯夫人”铭文,铜方壶盖2件,形制、纹饰、大小一样,上有“养伯”铭文,铜盘匜一套,三足铜器2件,铜簋2件。另外还发现一批铜车马器。玉器有玉璧、戈、璜、瑛、琥等。

M6与M5并列。M6墓口南北长6.0米、东西宽5米多,墓底距墓口深8.50米。该墓曾被盗掘,但随葬品仍然丰富,计有铜器鼎1、尊1、方彝1、簋2、觥1、熏炉盖1、鸛首1、铜编钟一套6件,上铸有“噩侯”铭文,铜铃钟一套5件、铜铃一套9件、还有车马饰等。玉器有戈、瑛、珠等。

M5。一棺一椁,出土有铜鼎2、鬲2、簋2、簋2、盘1、盥1;玉器有戈、璜、串饰等。其中铜簋、鬲上均有“噩姜”铭文。

M19、M20并列。M19出土有铜鼎、簋、盘匜、壶、铃、车马器等,其中簋、匜上均有“噩侯”铭文。M20出土有铜鼎、簋、盘、簋、盥;玉器有璜、戈、条形玉饰、鱼、珠等。其中篇上有“噩姜”铭文。

第二,墓葬的发现与发掘出土的文物,特别是标明了“噩侯夫人”、“噩侯”、“噩姜”铭文的青铜器,改变了人们对噩国及噩国历史的传统认识。

M1、M5、M6、M16、M19、M20等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噩侯”、“噩侯夫人”、“噩姜”的铭文,同时,从墓葬规模、结构、间距等方面看,M1为噩侯夫人墓,M5、M6、M7、M16、M19、M20为夫妻异穴合葬墓。可以看出,夏响铺噩国贵族墓地至少有四代噩侯在此埋葬,这为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国历史地望以及噩、养、郡等古国之间的关系等学术问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噩国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

从出土的《噩侯驭方鼎》、《禹鼎》等青铜器铭文分析,噩国于西周中晚期被西周王朝灭掉。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得知,为填补噩被灭后周王朝屏障南土的需要,周王封他两个舅父在南阳为申、吕之国。从夏响铺发掘的这批贵族墓地的情况来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噩国仍然在现在的河南南阳一带生存,但史实说明这种状况应该是周王朝灭噩国后,将噩国的王公贵族置于周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综合这批墓葬的结构、出土文物的时代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初步推断M5、M6的时代为西周晚期晚段。因为噩国在西周中晚期被周所灭,到M5、M6这个时期中间有缺环。我们相信,随着夏响铺下一期的考古发掘可能会解决这个疑题。

注释:

①《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商周彝器通考》、《博古图录》、《殷商金文集成》、《商周金文录遗》、《殷墟书契前编·后编》、《殷墟文字乙编》。曹淑琴:《噩器初探》、《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何光岳《扬子鳄的分布与鄂国的迁移》、《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②、③随州市博物馆编:《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1月。

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第二期田野发掘的相关资料有待整理。

⑤参见注释①

⑥《商周金文录遗》，文物出版社，1963：99

⑦《史记·楚世家》上海：中华书局，2005年

⑧《殷墟书契后编》二·三七·一三。

⑨《殷墟文字乙编》三七八七。《殷墟书契后编》二·一二·七、《甲骨续存》下·九一七。《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二〇五六。

⑩《殷墟书契前编》七·二六·四。《甲骨续存》下·一六六

⑪《殷墟文字乙编》一〇四九。

⑫《殷墟文字乙编》四六八〇

⑬《殷钟》

⑭《单伯鬲》、《蔡伯鬲》

⑮《殷尊》

⑯《小臣单觶》、《单伯觶》、《单吴觶》。李时珍：《本草纲目》卷43 麟部·鼯

⑰《殷墟书契前编》二·二一。

⑱朱芳圃：《甲骨学金史编》第一，民族。

⑲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释》卷一。

⑳《殷墟书契前编》四·四四·六。

㉑《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创刊号）

㉒《水经注·洧水》。

（本课题为2013年全市社科重点课题，编号EZSK13 LS007。课题组成员：丁堂华 方文徐胜国）

（责任编辑：李 志）

（上接第42页）到城乡地域多重二元差异的影响，因此完善分税制要超越财权与事权配比的传统思维，回归到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上，按公共产品的穿行原理，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财力进行基本的均衡配置。具体而言，要归并专项转移支付，将转移支付中的专项来源项目直接归并为一般综合性转移支付的支出责任项目。这样既可在取消专项转移支付的同时，强化地方对应的公共支出责任，也可在上下级财政体制中将零基测算与永续测算相结合，使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作为调整综合性转移支付的事由，突出综合性转移支付的体制意义。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着眼于区域财力均衡，也可实施相应的分税制。鄂州应该按照全域统筹的理念，调整和完善市对下财政体制。

（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分类制度

广义而言，政府全部的财政支出均具民生意义，都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要处理好整体性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优先和重点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分类，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真正打破城乡地域概念，突出以人为本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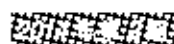
念，以农民作为公共服务的受益主体和农民的行为选择决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让公共服务跟着农民走，因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分类，一方面要以城乡公共服务基本性差异决定，另一方面要以农民市民化的需求来决定。这样分类可以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远效益。

（三）“一改两化”提升财力与机制保障

综合改革、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作为全省试验田、改革主战场的鄂州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为了给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利的体制机制保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新型社区服务体制改革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特别要根据鄂州资源禀赋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持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发展战略，让老城区与新兴城区竞相发展，打造鄂州经济升级版，不断提高城镇化率，通过农民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课题为2013年全市社科重点课题，编号EZSK13 SH050。课题组成员：熊忠厚 程焰山 陶新国 傅光明）

（责任编辑：尹智源）



一块石刻 再现瓜圻三国文化光彩

◎万齐文 余国桥

为了纪念吴王种瓜，潮人在吴王种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寺庙，取名瓜圻寺。瓜圻寺原址留存的一块石碑，捐款记录是200余年前瓜圻村余家畈信众捐修瓜圻寺的，石碑题头清晰刻有“大周列国吴王种瓜此地……”。

根据拍摄的石刻照片，“大周列国吴王种瓜此地……”10个字依稀可见。这块石刻揭开了樊湖历史的深处曾经有过的惊天大幕。鄂州市蒲团乡瓜圻村余国桥将这一惊人的发现和刻石照片送到市吴都文化研究所，吴都文化研究所组织了专题研究论证会，经过吴都文化研究所地域文化研究专家万齐文、周红兵、邱凤、陈运东、董晓平、余国桥、王长喜等人反复探研论证，认为这一石刻的发现，佐证了蒲团瓜圻吴王种瓜的历史，上推到了东周战国时期，在东周列国中确实有一个吴国，同时也是吴王，著名的吴王有阖闾、夫差等，吴国后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前495年）所灭。据《东周·春秋纪年表》记载，当时的吴国历七朝，共计有七位“吴王”。

东周列国时期的吴国，吴王不可能在樊湖种瓜，这里是楚国的地域，无论是春秋还是战国时期，吴国的吴王都没有来到过这里，史记上也没有这样记载，当然也谈不上于此种瓜。

但是，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三国吴王孙权曾于此地屯兵养马种瓜。这里至今留下了柯营、牧门、马房洲、瓜圻、梅城堡、仵城堡等地名、村名、埠名。

其一，《武昌县志·古迹》：“瓜圻在武昌县西南（《一统志》）。瓜圻在县西十里，何颙诗序云：吴王种瓜于此。《舆地纪胜》、《方輿胜览》、

《名胜志》并同。有送瓜沟，今名宋家沟。（熊志）”

其二，乾隆《武昌县志·郡县沿革》有“荷锄瓜圻”古遗迹的载文；

其三，清代严翼王《古姆山记》云：北望齐安（黄州）古赤壁、雪堂明若列眉，而横江野鹤，俨然苏子之孤舟也；东望寿昌所为避暑吴宫、洗剑池、瓜圻、牧门诸迹，未尝灭焉……这里有“吴王避暑宫、洗剑池、瓜圻、牧门”的载文，并把它们作为三国孙吴遗迹。

严翼王是葛店严家大埠人，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年）进士，曾任山东濰阳知县，古姆山位于严家大埠的西边不远处。

其四，《姜氏宗谱》记载，五份姜姓住的地方不远处，有“瓜村、仵城”的地名，五份姜姓人家，于元代落籍樊湖；

其五，历代文人、名士关于瓜圻的诗文。

明末清初诗文家周尔蔚（1603—1662），留有《孟传是西山招饮》诗：

粉榆姓字久皇然，今夕初逢乃少年。
结客樊山珠履尽，移家陶室石蹲传。
瓜圻月落来钟磬，枣墅香深奏管弦。
寒夜归城风瑟瑟，几星渔火睡江烟。

“孟传是，武昌县人。瓜圻为孙仲谋在武昌遗迹。枣墅为仙枣事，枣亭是太守和仙侔对奕处。”

清代周益（1840—1896），写有《瓜圻览古》诗：

望思依望桑阴斜，
骨肉戈矛生一家，
奈何摘瓜还种瓜。
摘瓜已伤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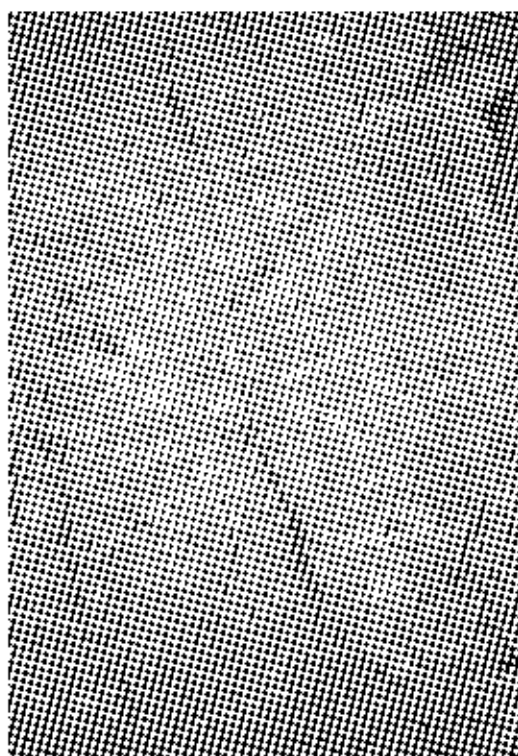
种瓜长引蔓。
武昌城西青不断，
瓜圻远接垂杨岸。
楚地种瓜非土宜，
寒泉争灌秋瓜肥。
民力已殚君不知，
君王避暑能几时。
铁锁沉江戍兵走，
楼船径过瓜州口，
武昌落日重回首。

可见，樊湖瓜圻作为古迹地名，在明清时期就已存在，并溶入了名人的诗文及有关文史资料之中。

综其上述，笔者认为：“吴王种瓜地”不应是东周列国时期的吴王，因为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吴王于瓜圻种瓜，应是三国时期的吴王孙权。

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都鄂，改鄂县为武昌县，吴黄武二年(223年)，吴王孙权于今瓜圻村不远处建了梅城(堡)，实为水军屯兵营地，现瓜圻这里留下了很多与三国吴王种瓜有关的地名，如瓜圻塘、瓜圻墩、瓜圻寺、送瓜沟、打鼓墩、宴功庙等。

这块石刻是瓜圻移民余家畈人在200年前建寺刻的石碑，据余家畈《余氏宗谱》记载，余姓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落籍瓜圻，当时他们只知道吴王在此地种瓜，对三国吴王孙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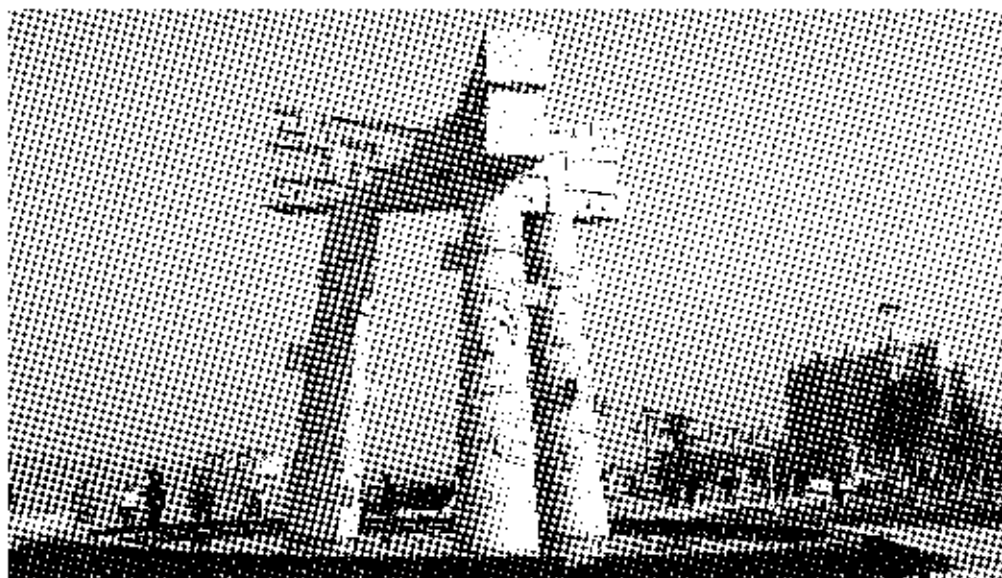


于此屯兵和牧门马房养马，瓜圻种瓜却知知甚少。

因此，吴都流传的瓜圻种瓜，是指吴王孙权。这里的柯营、牧门、马房、卽州、瓜圻都有三国文化的色彩。一块石碑刻石，揭开樊湖民间丰富的三国文化一角。

(作者单位：市吴都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尹智源)



浅议利用税收化解社会分配不公

◎杨重理

现阶段,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两极分化,是影响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笔者在此谈点浅见。

改革开放期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模式所执行的平均主义而言。即所谓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本意是鼓励那些遵纪守法,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先富起来。但市场经济机制、经济法规完善及政府职能转变有一个过程,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由初期的脑体倒挂,发展到后来的文艺、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收入迅速攀高,再发展到垄断行业,特别是那些占国家资源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石油、电信、烟草、金融、保险、公路、铁路、房产、土地等。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贫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

一个健全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又能使社会财富不能过多集中在少数人。这里就有一个“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度”决定社会性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体现在这个“度”上。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比如2012年秋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群众集会,提出的口号:财富的百分之九十九与百分之之一的关系。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客资本家们打着民主、自由的价值招牌,干的是唯利是图的勾当。他们在竞选时,对选民

许下种种美好的诺言,一旦当选,许下的诺言就被资本绑架,大多成为一纸空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次竞选许诺的实施医疗改革和对高收入人群扩大征税,直到他的第二任期,对高收入人群扩大征税的法案才得以通过,而且是财政悬崖所逼。而惠及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改革法案,则遥遥无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全体人民都有享受改革成果的权利。要做到全体人民共享劳动成果,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的功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涉及到如前所述的“度”,这个“度”就是社会管理学中的“科学发展观”。社会管理很重要的部分是社会的经济管理。那么,社会经济管理的“度”是什么呢,而控制这个“度”的工具是什么呢?这就是国家税收。

国家税收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简单地说,建国初期,国家税收完成了工商业改造,建立了较完整工业体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国家税收逐步边缘化,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期,国家税务局改为国家收入局,直至七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恢复国家税务局,并独立于国家财政机构之外。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国家税务地位越来越重要,职能也越来越突出。但是,我国税收的地位与作用要达到质的变化还有一定距离。

长期以来,税收被认为只是组织财政收入的工具。这已是一些从事理论工作的学者以及

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定论,也是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税收是撬动社会经济的杠杆。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将国家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唯一的重要的工具(包括关税),更将国家税收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杠杆。例如:美国经常使用提高关税税率,限制或禁止本国高端科技产品的出口,提高进口关税税率或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限制别国产品进口。又如:提高某种产品的税率,限制该项产品的生产,降低某种产品的税率,鼓励优先发展某种产品的生产等等。所以,国家税收不仅有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更有管理社会经济的杠杆功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这些功能将更趋明显。可见,税收是国家实现公平竞争平台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其它的工具如物价、信贷、利息、工资、奖金等则是社会经济管理的工具。究竟如何利用税收这个杠杆化解社会收入不公的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人们在炒油饭会联想到,锅是炒油饭的平台,至于这口锅是放在高级的燃气灶台上,或是放在土砖砌成的灶台上,还是放在三根树枝撑起的架子上都不重要。只要将食用油倒时锅里,点燃火,倒进米饭就可以炒了。但是锅底的饭粒吃的油多,而锅的边上越往上的饭粒吃的油少甚至根本没吃到油。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用锅铲不停地将锅底的饭粒铲到锅上边,将锅上边的饭粒铲到锅底。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不断地翻动,整锅饭的饭粒就会均匀地粘到油了。

这里的锅好比市场经济的平台,食用油好比社会财富,劳动者好比饭粒,锅铲好比税收的征收管理,税种税率好比火候。火候大了温度高了会将米饭炒糊,火候小了温度不够,米饭炒不熟,这火候就是一个“度”,科学性就体现在税种及税率这个“度”上。充分、科学地利用税收经济杠杆,就能化解社会收入不公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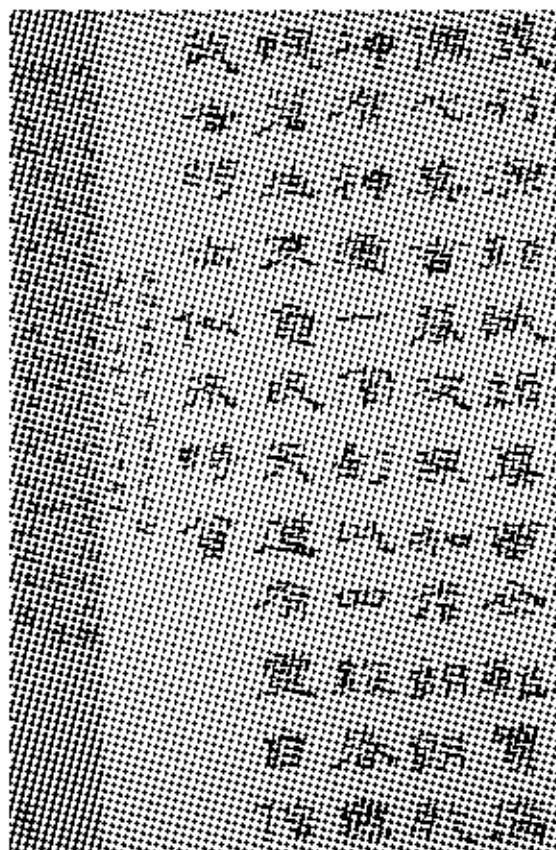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国家利用税收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进行初次分配,即征收流转环节的税收

税率应可高可低。国家利用税收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进行第二次分配,即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不仅税率可高可低,还可收取累进税,最高可达所得额的 55%。国家利用税收还可对不同行业不同收入的人执行第三次分配,如赠与税、遗产税、反垄断税等。

国家将税收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就为社会共享财富提供了物资保障。国家编制财政预算,一小部分用于国防以及国家机器外,大部分预算支出应为提高教育福利、医疗福利、最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离退休待遇费、伤残等弱势群体补助标准以及公益活动等,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系市国税局原调研员)

(责任编辑:徐喜元)



书法 李明峰

浅论文艺人才创作研发资源的有机整合

◎邓文兴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全面部署了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奋斗目标，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文化强国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艺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作为从事文化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面对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态势，感知肩负的责任更大，需要扎扎实实做的工作更多，需要走的路更宽广。本文就如何整合文艺人才资源、整合创作资源、整合研发资源的有机结合，增强文化“软实力”，予以浅析。

一、整合人才资源，树立人才兴文理念。我国正在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推进，文化强国的关键在于文化人才，艺术工作者、艺术家是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就文化人才这个范畴而言，有文化创作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文化科技创新人才等。人才是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是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坚实的可靠基础。要促进人才的健康快速成长，整合人才资源，开发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必须做到三个突破，即：突破地域性与整体性用人的观念，不拘一格地引进人才；突破只重视才而不重视德的观念，培养一批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拔尖人才；突破只顾眼

前而不顾长远发展的观念，逐步改变各门类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其一、建立人才机制。要遵循文化人才发展自然规律，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优秀文化人才库，摸清现阶段人才现状，运用市场配置的功能，搭建人才良性发展的平台，加快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断推出优秀新人才。重视培养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开发人才。优化老中青优秀人才结构，加强优秀专业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的跟踪服务和管理。出台与人才相关的各种政策和实施办法，用法律法规维护人才的合法权利，用机制促进人才的长效发展，用环境保障人才的长效成长。要建立表彰制度，评选表彰一批团结协作、开拓进取、成果丰硕的团体和德艺双馨的优秀人才，给予适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其二、实施人才工程战略。应采取多种途径、多种办法，分步实施人才工程战略，树立科学人才观，造就一批德艺双馨的拔尖和学科领军人才。要设立优秀人才资格委员会，实现文化人才鉴别、认定、引进工作的科学化。挑选一批优秀人才到省级、国家级培训基地或大专院校深造学习，不断提高文化人才理论素质、文化专业知识、文化创作技能水平。要整合文化人才资源，推进文化人才资源整体开发，实施“人才兴文”的战略，向省级、国家级推荐优秀文艺人才，搭建起人才长期良性成长的平台。

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造就一批有作为、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建立一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事业专班人才队伍。

其三、形成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要着力抓好文化人才的储备、扶持和服务工作,建立文化人才资源库,实施优秀文化人才重点文化项目立项工程,加大文化人才培训教育、重点优秀文化项目经费的扶持力度。组织文化人才参加省级、国家级学术研讨会、招标会等方面的活动。着力做好优秀文化人才信息交流服务工作,为他们及时快速提供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强国的观念,把文化强国建设作为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科学的文化发展经济指标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服务管理机制,制定科学可行的文化考核指标。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划方面的宏观管理及指导调控,把发展繁荣文化事业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促进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整合创作资源,树立创建品牌理念。按照以前传统的文化创作模式,文化文艺工作者仅靠单体或分散型的方式、方法开展创作活动,并且是零星的、没有整体实力,这种创作是原始的而没有具大的生命力。伴随着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日益明显,人民群众文化消费日趋旺盛,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新特点、新发展趋势,当今的文化创作资源,必须创新观念,打破以往那种老方式、老方法的观念,打造三个高地,即:打造集约型高地,结集同门类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的创作强势;打造精品高地,各门类的文化创作,应敏锐捕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创作出一批立得住、叫得响、能传承的文化精品;打造品牌高地,以地域文化特色为主题,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创作生产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创作生产必须要有潜在的资源,这种资源包括民族的、民间的、历史的、当代的等。如何整合这些占有的资源,创作生产出一批具

有时代特色、具有感染力、具有受众面广、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品和品牌,这是文化职能部门和文化人才必须担当的工作职责,同时也是实现文化强国、强省、强市的必然选择。一是组织文化文艺工作者“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开展文艺创作活动,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内涵丰富、艺术质量上乘、能传承发展的精品佳作。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在今后更长的时期内,围绕“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创作出一批精品,奖励一批精品,传承发展一批精品。二是推出一批展示时代风貌,体现地域特色,具有国家级、省级水准的文化品牌。通过充分挖掘和整合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创作出文学、书法、美术、摄影、民间工艺、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影视剧、动漫片等优秀文化品牌。要充分运用文化品牌效应,开展与其配套的文化商品、旅游商品的市场营销活动,变文化品牌为品牌经济。三是整合人文资源,面向全国、全省推介出一批名人、名作、名品,培育一批具有民族、民间的文学家、艺术家、工艺美术大师、艺术设计师等专家型人才,通过媒体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宣传推介名人、名作、名品,充分发挥名人、名品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作用。要运用市场配置的方法,将地域文化与地域旅游事业有机结合,开发出一批具有广阔前景和市场占有率的文化品牌。四是整合文化资源,实施五大文化工程:其一,基础设施工程,建立城乡较完善的文化场地,如文化站、图书馆、体育场、文化娱乐中心、影视宣传媒体等;其二,文化惠民工程,开展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进校园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成果;其三,文化网络工程,以宣传文化部门、文化馆(站)、文化中心户、农家书屋、文艺之家等平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文化网络,实现城乡文化网络全覆盖;其四,文化传播工程,以文艺作品、影视作品、舞台艺术、艺术展览、网站宣传、手机短信为主体,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传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其五,健康文化工程,以先进事迹报告会、演讲会、文化征文等活动为阵地,陶

治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健康发展。运用健康的文化,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运用健康的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吸引力,让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健康文化,崇尚健康文化,享受健康文化,用健康文化鼓舞人、激励人。

三、整合研发资源,树立文化产业理念。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关键在于人才,加大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力度关键在于抓落实,实现文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关键在于文化产业,三者之间互为促进互为作用。出人才、出作品、出效益是发展文化事业的核心内动力,也是实现文化怎样发展,向何处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性和全局性的问题,着力实现三个围绕:即:围绕文化研发资源、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因地制宜引进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文化人才;围绕市场做大文章,占领文化品牌制高点;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总趋势,实现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需要制定出科学的发展目标。

整合文化研发资源,创办文化新型产业,提高文化科技含量,是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战略目标。研发出高科技的文化项目,培育重点文化产业,必须要扶持具有导向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前景看好、受众面宽广的文化产品,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文化事业。

(一)形成文化产业研发机构。采取国有与民营资本并驾齐驱的方式,形成国有和民营股份制文化产业科研机构,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研发科技人才队伍,研发出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精品和高科技产品。一是政府要制定出台有关促进文化产业研发机构的优惠政策,形成自我发展、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运用市场经济这个杠杆来检验研发机构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文化产业研发机构应与文化产业形成有机的产业链,研发出具有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的文化项目,树立人文意识、精品意

识、品牌意识,打造一流的文化科技名牌,打造一流的文化科技队伍。三是要形成自我激励制度,采取以政府主导、非公有资本相结合的方式,要设立奖励基金,对有突出贡献的文化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予以奖励,促进文化研发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形成文化产业工程。要遵循文化科学发展规律,不断创新文化发展新理念,以服务人民、服务精神文化生活为落脚点,以引领文化产品研发、创作、生产为着力点,注重运用政策、法律、市场、税收、舆论等手段,引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形成全社会关注和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政府应加强对文化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资源投入、市场准入、市场营销和监管等方面的宏观管理及指导调控,形成具有长远、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文化产业工作局面。

(三)形成文化产业基地。加快形成以文化重点产业为主导,相关产业联动发展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多种途径形成具有法人资格、自主创作生产、多种体制的文化产业基地。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有序竞争、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这是当今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方向。做好文化企业的引进工作,大力培育外向型股份制文化企业,形成研制、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信息链。以列入国家级、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域性、民间性的优秀文化项目,做大做强区域文化品牌产品,力争涌现出若干国内知名文化产品,形成有关门类的优势文化知名拳头产品和知名品牌。应发展各类文化中介机构,支持民间资本组建股份制多元化、多样式的民间文化产业公司,在市场上享受与国有企业经济投资同等的优惠待遇。应加强文化企业与科技相互合作,推动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结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大市场的占有率,增强文化产品的传播力、表现力、感染力,为全面促进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上新台阶、作新贡献。

(作者系市文联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李 志)

鄂州职业大学学术带头人——陈静



陈静,鄂州职业大学教授,管理学院院长。湖北省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会评委,鄂州市社科专家库专家,鄂州市旅游培训中心主任。

近年来,在国内公开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9 篇;专著《教师道德建设》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教材 1 套,参编教材 1 部;完成省级教科研项目 2 个、校级教科研项目 2 个;目前正在研究省级重点教科研项目《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研究》。

科研成果曾荣获鄂州市人民政府专项奖 1 项,荣获湖北省社科院专项奖 1 项,荣获鄂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项奖 2 项,荣获鄂州职业大学教学成果奖 1 项。

曾荣获中共湖北省委高校工委、湖北省教育委员会“思想品德课优秀教师”称号,获鄂州市“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获市级“十佳巾帼岗位标兵”称号;多次荣获校级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创建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先进个人等称号。

湖北省检察业务专家——张友来



张友来,中共党员,湖北鄂州人,1971 年 9 月生。现任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法学硕士,湖北省“检察业务专家”、鄂州市社科专家库专家。先后在原市国家安全局、市人民检察院、梁子湖区人民检察院工作。2013 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运行规制研究》得到了导师李红海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俞江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全体专家的高度评价,并被评为优秀硕士毕业论文。2013 年被评为湖北省“检察业务专家”。近两年来,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1 篇入选 2013 年度全国刑事诉讼法学年会论文集,1 篇入选第十三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论文集,连续三届在全省检察发展论坛上交流研究成果,2014 年被推选为省检察院驻院研究人才及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兼职讲师。

(责任编辑:徐喜元)

省社科院“城乡一体化”课题组来鄂州调研

5月5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城乡一体化”课题组一行5人在曾建民研究员(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带领下,专题调研鄂州市城乡一体化推进情况,通过实地体验、随机访谈、重点约谈、调查问卷、数据采集等方式,详细了解鄂州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作法、基本路径、基本经验、制约因素、面临的困难等方面的情况,以此对鄂州城乡一体化进行基本评估,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调研组先后到梁子湖大垸社区、鄂城区岷山社区、池湖社区以及池湖生态农业基地实地考察,还组织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座谈。市委高度重视此次调研活动,事先责成各相关单位做好调研准备,市委副书记陈新林亲自参加座谈指导调研,并与调研组和各职能部门交流了相关意见。

(李 志)

2014年省、市社科应用课题完成立项

6月10日,市社科联组织申报的“新形势下鄂州市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和创新”、“鄂州市基层社会工作组织孵化器及其人才培养”等10项社科应用研究课题通过2014年度湖北省社科联“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评审立项;“太和地域文化的发掘与旅游开发”等15项课题通过2014年鄂州市社科应用研究课题立项。

今年,省社科联开始设立“基层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以此加大对市州社科工作的扶持力度,推动全省社科工作繁荣发展,旨在积极探索理论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全面提升全省基层社科工作者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提升社科研究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所有通过省级立项的课题,省社科联将拨付专项资金,支持课题组深入开展调研。课题结项后,将在省社科联与各市州社科联共同主办的《领导参阅·市州版》上择优刊登,为省、市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尹智源)

道德讲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月26日,市委宣传部第二期道德讲堂举

办:本次道德讲堂按照“诵一段中华经典,唱一首道德歌曲,讲一个身边故事,谈一番心灵感悟,作一次精彩点评”五个环节展开,全省首届“荆楚楷模·湖北好人榜”上榜人物、市实验小学教师吕杨介绍了捐献其子胡永卓遗体器官的感人事迹,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本次道德讲堂是市委宣传部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的重要内容,由市社科联具体承办。近30家市直部门和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祝捷)

省社科普及基地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座

5月24日,湖北省社科普及教育(鄂州)基地举行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讲座。此次讲座特邀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兆强先生作主讲嘉宾。黄教授引经据典,从正反方面,以“名、利、色、权”等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阐述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黄教授讲授生动,互动性强,学生踊跃提问、发言,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徐喜元)

省社科普及基地举办少儿经典诵读比赛

5月25日,由鄂州市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社科普及教育(鄂州)基地主办的第二届“诵读经典,分享快乐”少儿经典诵读比赛在鄂州市图书馆“吴都讲坛”报告厅隆重举行。此次比赛精心筛选了精彩诵读节目34个,来自全市各小学校300多名小选手参加了比赛。比赛现场,小选手们通过配乐、舞蹈、合唱等艺术手法的烘托,诵读了“弟子规”、“千字文”等中华民族的国学经典和优秀古典诗词。孩子们动情的朗诵、倾情的表演,展现了我市小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此次活动,旨在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展示的平台,让经典浸润孩子们的心灵,陶冶孩子们的情操,让国学教育起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陈建新)

充分发挥检察学会“两器”作用 推进全市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张友来

近年来,市检察学会在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结合自身特性,在检察调研、检察业务、检察文化、检察管理等方面,积极发挥助推器、服务器作用,不断推进全市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

一是以学会为平台,推动检察调研建设。市检察学会充分利用社团优势,始终把开展检察理论研究作为学会工作的一项重点,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各类理论研究,及时向省级以上刊物推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认真办好《鄂州检察》内部刊物及鄂州市人民检察内外网站建设,积极为会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园地和平台,更好地为检察工作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2013年以来,市检察学会会员共形成各类理论研究和专题调研成果70余篇,其中省级以上采用30余篇,10余篇调研成果获各级奖项。

二是以学会为抓手,推动检察业务建设。市检察学会结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对会员采取召开座谈会、专题研讨会、专题讲座等方式方法,就新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检察工作中的适用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提高会员的法律业务素质能力,促进各项检察业务的开展。

三是以学会为载体,推动检察文化建设。市检察学会多次组织会员开展书法比赛、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湖北省廉政文化作品参展等

文娱活动,建立市院检察信息调研宣传业余学习QQ群,开通市院官方微博,进一步丰富文化活动方式,丰富干警的精神生活,陶冶干警情操。近期,检察学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参加中国检察官文联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检察官文化论坛,对检察基层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专题研讨会,进一步推动检察文化建设。

四是以学会为窗口,推动检察管理建设。市检察学会进一步创新管理手段,完善基层院考核办法、岗位能力席位考核标准,对检察系统内部会员实行干警履职业绩动态管理,加强流程管理和过程控制,逐步实现工作的全程化、精细化、实时化和公开化管理。同时,市检察学会还加大办公现代化建设力度,按省院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检察专网分级保护、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软件应用工作,实现了检察工作信息化、办公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提升检察管理的水平与实效。

(作者系市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徐喜元)



让潜规则失去生存的土壤

◎ 辛士红

孩子上学要托关系、做个手术要送红包、承包工程要利益分成、个人进步要会跑会送……社会生活中的“求人”之痛，印证了潜规则的为害之重、积弊之深。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强调，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可谓切中其弊，直击要害。

潜规则，是规章制度之外实际存在的不成文、不公开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就像《红楼梦》中门子告诉贾雨村的那个“护官符”，“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尽管为多数人所不齿，可又无远弗届地影响着人们关键时刻的选择；尽管摆不上台面，可又无处不在地彰显着另一种力量和能量。

当年，梁启超曾沉痛地指出，晚清帝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潜规则盛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当“红头不如笔头，笔头不如口头”成为常态，不少人自然会心照不宣地选择关系；当“不给甜头不点头，给了甜头乱点头”成为现实，不少人自然会随波逐流地选择迎合；当找“靠山”胜过找组织，走程序变成走过场，不少人自然会你行我效地选择投靠。潜规则和显规则，从来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正常渠道”一再显示“此路不通”或“敬请绕道”，吃亏吃苦、无助无助的，只能是老实正派的守规则者。

“乱世之乱，祸害有时；太平之乱，国无宁日。”所谓“太平之乱”，潜规则盛行即是其一。治国理政，讲究的是私不乱公，邪不干正。劣币效应告诉我们，潜规则大行其道，歪风邪气必然逞威，公平正义必然受损。这不但会动摇人们对规则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仰，而且会使整

个社会颠倒荣辱观念、扭曲价值取向。

潜规则为什么会不翼风行、广为流布？无论是打招呼的“大天线”“小天线”，还是顶大用的“票子”“条子”；无论是投桃报李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还是利益结盟的亲友圈、老乡圈，都是潜规则发挥作用的便捷通道。能够“逢山开道，遇河架桥”的，只有逃出笼子的权力。

潜规则为什么能得到认同、攻城略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潜规则虽然不是什么红头文件、公序良俗，但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比如，“明知不对，又怕吃亏”的盲从心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攀附思想、“欲罢不能，吃着上瘾”的“臭豆腐心态”等，让许多人或身不由己、或心甘情愿地被潜规则绑架和裹挟。

潜规则为什么久攻不克、屡禁不止？优质资源的稀缺、政策制度的漏洞、法规执行中的变形走样、权力运行中的“暗箱操作”，是潜规则得以“春风吹又生”的肥沃土壤。如果只治标不治本、只授权不监督，潜规则就可能长期安营扎寨，即使一时打压下去，风头一过，还会卷土重来。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潜规则的克星是不容变通的铁规矩。“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越是敏感的岗位，越是群众意见集中的地方，越需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机制，越需要领导干部秉公用权，不徇私情。

哲人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当按规矩办事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当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深入人心，哪还会有潜规则的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

（责任编辑：尹智源）